

## 毛主席语录

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

## 毛主席语录

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 出 版 说 明

在纪念革命导师马克思的光辉著作《哥达纲领批判》写作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出版了大寨贫下中农理论组编写的《学习〈哥达纲领批判〉 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这本书。

大寨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表彰的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它是我国广大农村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坚持继续革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光辉榜样；也是我国亿万农民在党的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的光辉榜样。在全国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重要指示的高潮中，大寨贫下中农理论组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重新学习了《哥达纲领批判》，并在中央党校同志的帮助下，编写了这本书。这是大寨贫下中农决心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器，加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整个上层建筑领域的又一实际行动。

工农兵编写解释马列著作的书，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出现的新事物。大寨贫下中农理论组编写的这本书，以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纲，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和切身体会解释了《哥达纲领批判》中的基本原理，理论联系实际，通俗易懂，读了使人很受启发。我们怀着十分高兴的心情，第一次出版我国贫下中农解释马列著作的书，并把它推荐给读者。

人民出版社编辑部

一九七五年五月

# 目 录

前言.....	1
一、《哥达纲领批判》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 .....	7
二、彻底消灭私有制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	16
三、地主资产阶级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 .....	33
四、社会主义社会总产品的分配必须坚持马 克思主义的原则 .....	39
五、正确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限 制资产阶级法权.....	56
六、为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创造条件.....	72
七、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可靠同盟军 .....	80
八、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 人 .....	88
九、用革命手段消灭雇佣劳动制度 .....	95
十、暴力革命是推翻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 的唯一道路 .....	104

十一、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	111
十二、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	120

## 前 言

在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大寨贫下中农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教导，在党支部的领导和带动下，组织了学习理论小组，办起了政治夜校，白天上地劳动，晚上看书学习，掀起了学习理论的热潮。几年来，我们坚持自力更生学、硬着头皮学、联系实际学的方法，读了一点马列著作，懂得了一点马列主义。所说自力更生学，就是要自觉地学；所说硬着头皮学，就是迎着困难学，克服困难学，刻苦钻研学。《哥达纲领批判》就是我们在攻读马列著作过程中读过的一部书。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发表以后，我们再次学习了伟大导师马克思的这部光辉著作。我们体会到，《哥达纲领批判》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性文献。马克思在这部光辉著作中，不仅彻底批判了拉萨尔的机会主义路线，而且提出了关于共产主义发展两个阶段的原理，展示了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光辉远景，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理论。学好《哥

达纲领批判》，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学习《哥达纲领批判》有助于加深对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理解。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理论问题搞不清楚，就分不清真假马克思主义，容易上当受骗，甚至会变成修正主义。李卜克内西<sup>①</sup>所以犯了原则性的错误，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在理论问题上从来是含糊不清的（第62页）<sup>②</sup>。毛主席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这就明确指出了我们要搞清楚和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反修防修问题，是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问题。《哥达纲领批判》的核心是讲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

---

① 威廉·李卜克内西（1826—1900），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普法战争期间（1870—1871）反对本国政府侵略法国的战争，热情支持巴黎公社。1875年在同拉萨尔派合并问题上，犯有原则性错误，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严厉批判。

② 本书中的引文凡未注书名只注页码的，都是指《哥达纲领批判》单行本的页码。

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第 22—23 页）我们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弄清楚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一百年来的斗争实践证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坚持还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历来是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斗争的焦点，是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一切机会主义者惯用的手法，就是在理论问题上制造混乱，妄图达到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总是千方百计地以“革命”的面目出现，打着红旗反红旗，阉割和歪曲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拉萨尔是这样，刘少奇、林彪也是这样。学习《哥达纲领批判》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识别路线是非的能力，识破反革命两面派嘴脸，分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什么是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批林批孔、反修防修的强大思想武器。只有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才能深入批判林彪“克己复礼”的孔孟之道，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批判自发的资本主

义倾向，扫除资产阶级的歪风邪气，把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进一步促进全国的安定团结，发展大好形势。

学习《哥达纲领批判》有助于加深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意义的理解。无产阶级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逐步造成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最后消灭阶级，还需要花很长的时间，走艰苦曲折的路程。在这过程中，有很多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要我们去解决。毛主席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毛主席还指出：“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在农村，生产资料所有制变革以后，农民走上了集体化道路，并且已走了二十多年；今后还要不要继续革命，革谁的命，怎样革

命，这个问题也必须弄清楚。学习《哥达纲领批判》对于理解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弄清这个问题，很有帮助。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第12页）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是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限制以至最后消灭资产阶级法权，铲除滋生资本主义和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壤，逐步消灭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痕迹。学习《哥达纲领批判》能够帮助我们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弄清楚。

学习《哥达纲领批判》有助于加深对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解。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的基本路线，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尖锐性，告诫全党对这个问题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这一论断，正是从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中产生，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不可调和这一点得出来的。因此，认真学习《哥达纲领批判》，深刻研究马克思的这一科学论断，能使我们加深对党的基本路线的理

解,能使我们提高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

目前,我国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要把革命工作做到底,学不好马列主义理论是不行的。只有在理论上搞清楚,才能做到在政治上不糊涂,方向上不迷路,原则斗争不含糊,继续革命不停步。过去,我们虽然在学理论方面有了一点收获,但并不完全自觉。今后,我们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不断提高我们的马列主义水平,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

这本书是我们学习《哥达纲领批判》这部光辉著作的一些体会,是在中央党校同志们的帮助下编写的。我们原则上是按照原著的章节顺序,抓住原著中的重点,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和切身体会来写的。编写解释马列著作的书,对我们来说还是初次尝试,并不是没有困难的。我们的目的是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运动中,同广大工农兵互相学习,互相交流,互相促进。由于我们对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学得还很不够,难免有缺点和错误,殷切希望工农兵战友批评指正。

## 一、《哥达纲领批判》是两条 路线斗争的产物

《哥达纲领批判》是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总结，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纲领性文献。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对于学好这部著作，提高我们的路线斗争觉悟，是非常必要的。

### 《哥达纲领批判》是在两条路线的 激烈斗争中产生的

《哥达纲领批判》写于一八七五年，到今年已经一百周年了。早在一百年前，在国际工人运动中，马克思主义路线同机会主义路线就进行着激烈的斗争。这部著作是马克思为批判德国工人运动内部以拉萨尔为头子的机会主义路线而写的。

拉萨尔机会主义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同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是资产阶级和

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工人运动内部、在工人政党内部的反映。一八四八年的德国资产阶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对封建专制制度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道路。一八六〇年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工人阶级队伍迅速扩大,人数增加到几百万,成为巨大的社会力量。工人运动的日益发展,对资产阶级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在这种形势下,资产阶级就勾结封建势力,千方百计破坏工人运动,控制工人组织,从而使斗争更加尖锐复杂。这时,机会主义者、野心家拉萨尔打着社会主义旗号,混进工人运动,骗取了工人的信任。一八六三年五月“全德工人联合会”成立时,拉萨尔窃取了第一任主席职务。他虽然在一八六四年为争夺一个女人同别人决斗时死了,但他的门徒继续控制这个组织。这样在德国工人运动中就形成了第一个机会主义派别——拉萨尔派。

拉萨尔出身于富商家庭,当过律师。一八四八年德国革命时,他认识了马克思,曾参加马克思主办的《新莱茵报》的工作。但是,拉萨尔并不是一个革命者,而是一个反革命两面派。一方面,他自称是马克思的学生;另一方面,他利用被他肆意歪曲了的马克思的学说,到处招摇撞骗,捞取政治资本。他同反

动政府的头子俾斯麦<sup>①</sup>多次密谈,经常通信,死心塌地为地主资产阶级效劳。所以,拉萨尔是暗藏在德国工人运动内部的内奸和工贼。

拉萨尔为了维护地主资产阶级统治,反对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起来革命,东拼西凑地炮制了一条机会主义路线。他胡说什么,工人阶级只要争取得到普选权,把自己的代表选进议会,德国就能变成“自由的人民国家”,工人阶级就可以依靠这个“国家的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一旦生产合作社在各地普遍建立起来,社会主义就实现了。可见,拉萨尔机会主义路线的实质,就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拉萨尔机会主义进行了长期的不调和的斗争,用革命理论武装德国工人阶级。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帮助教育下,德国工人运动内部以李卜克内西、倍倍尔<sup>②</sup>为代表的革命派,于一八六九年在德国的爱森纳赫城召开了先进工人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德国工人阶级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工党

---

① 奥托·俾斯麦(1815—1898),普鲁士王国、德意志帝国的首相。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

② 奥古斯特·倍倍尔(1840—1913),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

(爱森纳赫派)，通过了党的纲领（爱森纳赫纲领）。这个纲领明确提出要坚决反对当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要为消灭一切阶级统治而斗争，宣布爱森纳赫派是第一国际<sup>①</sup>的一个分支，拥护国际的一切努力，等等。这样，在德国工人运动中就出现了代表两条不同路线的两个组织。

爱森纳赫派同拉萨尔派在对待国内外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存在着根本分歧，各自执行着根本不同的路线。爱森纳赫派在国内，主张用革命手段推翻德国各邦的封建政权，建立革命政权，自下而上地统一四分五裂的德国；在国际上，它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帜，参加了第一国际，反对本国反动政府侵略法国的战争，支持巴黎公社革命。爱森纳赫派基本上执行了马克思主义路线，在工人中享有很高威信，力量不断壮大。拉萨尔派在国内支持反动政府用反革命战争的手段自上而下地统一德国的政策；在国际上，拒绝参加第一国际，以狭隘的民族主义对待国际工人运动。拉萨尔派由于执行机会主义路线，遭到越来越多的工人群众的反对，内部四分五裂，面临垮台的危险。为了摆脱困境，拉萨尔派的头目于一八

---

<sup>①</sup> 第一国际即国际工人协会（1864—1876），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和领导的无产阶级国际组织。

七五年提出了要同爱森纳赫派合并的建议。

马克思恩格斯一直非常关心两派的合并。他们认为,在两派合并的问题上,从一开始就应当明确表示我们**决不会拿原则来做交易**(第6页)。工人阶级队伍的团结和统一,是革命胜利的保证,但团结和统一必须建立在革命原则基础上,必须同拉萨尔机会主义作坚决斗争。如果要合并,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求**他们不再做宗派主义者,不再做拉萨尔派**(第32页)。否则不要急于同他们在组织上进行合并,可以先订立一个反对共同敌人的行动协定,以便在对敌斗争中揭露他们的机会主义面目,教育和争取广大工人群众,为在革命原则基础上的合并创造条件。

但李卜克内西等人过分醉心于两派合并,甚至荒谬地把毫无原则的合并看作是一件好事。他们不但把马克思恩格斯的一贯教导置于脑后,反而散布在合并时“必须有所让步”的言论,并派出代表进行谈判。李卜克内西本人还参加起草了充满拉萨尔观点的纲领草案,同意把拉萨尔鼓吹的“用合法手段争取自由国家”、“依靠国家帮助”实现社会主义、“废除铁的工资规律”、“实行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等等机会主义谬论塞进纲领草案。

马克思恩格斯看到这个纲领草案后,怀着极大

的无产阶级革命义愤，分别写信给爱森纳赫派的领导人白拉克<sup>①</sup>、倍倍尔等，指出这个纲领草案是一个“**极其糟糕的、会使党堕落的纲领**”（第5页），“**纲领中差不多每一个字都是应当加以批判的**”（第36页）。为了捍卫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彻底批判拉萨尔机会主义，提高德国党和工人阶级的觉悟，马克思写了《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对纲领草案的内容，作了系统的几乎是逐句逐字的批判，这就是后来所说的《哥达纲领批判》。但是李卜克内西等人顽固坚持错误立场，于一八七五年五月二十二日到二十七日在德国哥达城召开的合并代表大会上，对这个草案只作了个别文字上的修改就通过了，这就是被恩格斯斥之为**杂乱无章、毫无联系、不合逻辑和丢丑的**（第43页）《哥达纲领》。

## 《哥达纲领批判》的发表是 对机会主义的沉重打击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阐述的革命理论和革命策略原则，当时并没有被德国党的主要领导

---

<sup>①</sup> 威廉·白拉克（1842—1880），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

人所接受。他们拒绝批评，没有在党内传达，也没有公开发表这个文件。

马克思写了《哥达纲领批判》以后的一些年中，德国的国内外阶级斗争出现了新的形势。这时正处于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时期，大批小生产者贫困破产，加入了工人阶级队伍，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化。德国统治阶级在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压力下，不得不改变反革命策略。他们一方面用金钱拉拢工人阶级上层分子，培植工人贵族，为资产阶级效劳；另一方面，被迫于一八九〇年废除了反社会党人法<sup>①</sup>，扬言要实行社会改良的“自由主义”政策，借以欺骗人民群众。在这种形势下，德国党由地下转向公开活动，参加了国会选举并在选举中获得一些胜利。这时，机会主义分子乘机跳了出来，大喊大叫什么德意志帝国已经能够“按照全体人民的利益”办事了，胡说什么只要进行宣传工作，争取更多的选票和议席，就可以“和平地”实现社会主义。另外，一八九〇年十月德国党在哈雷召开的代表大会，决定起草新的纲领代替《哥达纲领》。通过十几年阶级斗争

<sup>①</sup> 反社会党人法，也叫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为镇压国内日益壮大的工人运动，在1878年10月通过的反动法令。1890年，在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强大压力下，德国反动政府被迫宣布废除这一法令。

的实践，德国党的一些领导人虽然逐步认识到《哥达纲领》需要修改，但他们还不能从思想上理论上同拉萨尔机会主义彻底划清界限。而李卜克内西在哈雷的党代会上作报告时，甚至还不指名地指责马克思，埋怨马克思对他的批评，攻击《哥达纲领批判》。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能按照马克思的教导认真修改党纲的问题，就严肃地摆在德国党的面前。伟大导师马克思在一八八三年逝世了，这时领导国际工人运动的重担，完全落在恩格斯一个人的肩上。为了反击机会主义的进攻，教育广大党员和工人群众，同机会主义路线划清界限，沿着正确的斗争方向前进，也为了使即将在爱尔福特召开的党代会制订新的党纲时，能够清除拉萨尔机会主义的流毒，恩格斯决定发表《哥达纲领批判》。

但是，恩格斯的这一革命行动，却遭到机会主义者的疯狂反对。他们公开声明反对马克思对拉萨尔的批判。对机会主义分子的诬蔑和叫嚣，恩格斯轻蔑地说：“**这对我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还抵不上跳蚤咬一口**”（第63页），“**如果我要讲话，任何国家的任何党都不能迫使我沉默。**”（第64页）当时德国党的一些领导人如倍倍尔也表现得犹豫动摇，担心发表这个文件会给敌人提供攻击党的武器。恩格斯分别给他

们写信,批评他们的错误态度,指出在新的党代会即将召开,要修改《哥达纲领》的时候,如果还不发表这个最重要的文件,那就是犯罪行为。更重要的是,拉萨尔机会主义的流毒仍然存在,现在已到了彻底批判的时候了。至于担心发表以后会被敌人利用来攻击党,那是多余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正是无产阶级政党不同于其他政党的重要标志,正是它具有生命力的表现。这样做不但不会给党带来损失,相反,会使它更加巩固和强大。

经过坚决的斗争,恩格斯终于迫使德国党的领导人,于一八九一年一月三十一日在德国党的刊物《新时代》上发表了这部光辉著作。这是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的重大胜利,是对机会主义的沉重打击。

《哥达纲领批判》发表的这一事实本身,说明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长期性、尖锐性和复杂性。机会主义分子、修正主义分子,一有机会就要跳出来,反对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我们党建立以来的五十多年中,就经历了十次大的路线斗争。今后这样的斗争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把反修防修的斗争进行到底。

## 二、彻底消灭私有制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但是《纲领》却背叛了这一革命真理，它回避所有制问题，用空谈“劳动”和“社会”的手法，掩盖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实质，妄图取消无产阶级革命。伟大导师马克思采取层层剥皮的办法，把它揭得原形毕露，批得体无完肤，明确指出，作为工人阶级政党的纲领，必须阐明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劳动人民受压迫受剥削的根源，而彻底铲除私有制这个社会祸害，是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

### 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劳动人民 受剥削受压迫的根源

在旧社会，为什么“编席的睡土炕，织布的光脊梁，盖房的没房住，种地的饿肚肠”？不同的阶级对

这个问题有不同的回答。地主资产阶级为了掩饰自己占有生产资料剥削劳动人民的罪恶，往往把人们受苦受穷的原因说成是“懒惰”，好象人们单凭辛勤劳动，就可以摆脱贫困。《纲领》正是站在这样的地主资产阶级立场上，回避生产资料归谁占有这一根本问题，提出什么“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的奇谈怪论。对于这一反动谬论，马克思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针锋相对地反驳说：**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第7页），自然界和劳动一起才是财富的源泉。我们劳动人民受苦受穷最根本的原因是没有掌握生产资料，创造出来的财富被地主资产阶级剥削去了。

我们劳动人民都知道，创造财富必须要有两个条件，一是人的劳动，一是物质资料，二者缺一不可。人们只有具备了工具、机器等劳动资料和土地、矿山、森林、水源等劳动对象（二者合称生产资料），经过人们的劳动，才能创造出粮食、棉花、钢铁、煤炭等有使用价值的物质财富，满足人们的需要。一个赤手空拳只有劳动力的人，不仅不能创造财富，就连劳动也无法进行。俗话说：“巧妇难做无米之炊”，就是讲的这个道理。当然，如果没有人的劳动，土地就不可能自己长出粮食来，埋在地下的矿石也不会

自己跑出来。我们大寨贫下中农常说：“粮从地起，地靠人种，人勤地不懒，汗水换来粮增产”，就是讲在创造财富中人的劳动和自然界的辩证关系。因此，《纲领》只提劳动，不提物质条件，不仅违背客观事实，而且在理论上也是完全错误的。

有人说，既然“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这种说法是错误的，那么，通常所说的“劳动创造人类世界”的提法对不对？我们认为这是对的。它所回答的不是财富的来源，而是世界上的财富是谁创造的这样一个问题，是强调在征服自然和改造社会的过程中劳动人民的巨大作用。“劳动创造人类世界”的提法，是以劳动具备了物质条件为前提的。它说明社会物质财富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地上固有的，更不是神仙皇帝恩赐的，而是人民群众用劳动创造的，这和《纲领》空谈劳动的谬论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恩格斯说过：“**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变为财富。但是劳动还远不止如此。它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sup>①</sup>恩格斯的这段话，既批判了“劳动是一切财富

和文化的源泉”的错误，同时又肯定了劳动在创造人类世界中的伟大作用。它是批判“剥削有理”论的有力武器，是鼓舞我们劳动人民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精神力量。

人类征服自然界的主观能动作用是无穷的。做了国家主人的劳动人民更是如此。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sup>②</sup>我们大寨大队地处太行山区，穷山恶水，自然条件差，年年有灾情，过去是人穷、地穷、村穷。解放后，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实现了集体化，依靠集体经济的力量，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经过二十多年的战斗，斗得高山低了头，斗得河水让了路，斗得沟梁变平原，斗得低水上山头，斗得产量步步高，社员生活大改善，七斗八斗，斗出了一个红彤彤的社会主义新大寨。现在，大寨的山变了，地变了，村变了，更重要的是人们的精神面貌

---

① 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08页。

②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第5—6页。

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过去被束缚在私有制下的农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已经和正在逐步改造成一代社会主义的新型农民。

既然劳动和自然界相结合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为什么《纲领》却只提劳动，不提物质条件呢？这是机会主义者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卑劣手法。马克思告诉我们：“只有一个人事先就以所有者的身分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当做隶属于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第7页）这就是说，一个人只有在他占有生产资料并归他支配的时候，他的劳动才能与生产资料相结合，他的劳动才成为财富的源泉。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资料被地主资本家霸占，失去生产资料的工人和贫下中农根本不能以所有者的身分来支配生产资料。劳动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是在地主资本家的奴役下进行的，劳动创造出来的财富也归地主资本家所有。这个事实有力地说明：工人做工，农民种地，看起来只是同自然界打交道，实际上也是同人打交道，首先是同地主资本家打交道，受他们的剥削，

否则就不能做工，就不能种地，就生活不下去。《纲领》空谈劳动，不敢触及生产资料为地主资本家占有这一要害，这完全是适应地主资产阶级需要的。所以马克思尖锐地指出：“**资产者有很充分的理由给劳动加上一种超自然的创造力**”（第7页）。如果按照《纲领》的这种说法，人们没有生产资料单凭劳动就能创造财富，那么，地主资本家就可以颠倒黑白地把自己的剥削起家说成是“辛勤劳动”、“善于经营”的结果；而把劳动人民受剥削受压迫所造成的贫困，污蔑为“懒惰”、“不爱劳动”造成的。这样，社会上贫富悬殊的现象就同所有制无关，劳动人民也就用不着推翻剥削制度，用不着进行革命，地主资产阶级就可以永世长存，劳动人民受压迫受剥削的状况就永远不能改变。显然，这是《纲领》有意贩卖拉萨尔机会主义的黑货，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资产阶级谬论。

我们大寨贫下中农在旧社会，为什么终年劳动不得温饱？为什么世代受苦受难不得翻身？归根结底就在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个根子上。解放前，我们大寨共六十四户，耕地近八百亩。四户地主、富农占全部耕地百分之七十，约占总户数百分之七十五的贫下中农，只有土地百分之十八。人多地少，怎么能生活下去呢？贫下中农为了生存，就不得不租

种地主的土地,就不得不扛长工,打短工,下窑挖煤,当牛做马,受尽地主资本家的残酷压榨,过着饥寒交迫的悲惨生活。陈永贵同志十岁就当小长工。在他童年的时候,地主逼得他离乡背井,家破人亡。父亲忍痛先后卖掉了母亲、姐姐和弟弟,接着又含恨上吊死去。有这种血泪斑斑的家史的,岂止陈永贵同志一家?解放前,我们大寨就有十几户人家讨吃要饭,七户人家被天灾、地租、高利贷害得断门绝户。旧社会流传着一首民谣:“农民头上三把刀,地租重,利息高,苛捐杂税多如毛”,它深刻地反映了丧失生产资料的广大劳动人民的悲惨处境,也说明几千年来剥削阶级占有生产资料是我们劳动人民的穷根子。马克思尖锐地指出:“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占有劳动的物质条件的他人做奴隶。他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劳动,因而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生存。”(第7页)劳动人民在这样的社会里,不革命,不造反,哪有活路!

## 空谈“社会”是为剥削制度辩护

在旧社会,我们劳动人民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

骑在我们头上的，不仅有直接掌握生产资料的地主资本家这帮吸血鬼，而且还有为他们服务的大大小小的官僚和人数庞大的军队、警察等等。我们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被地主资本家和反动政府巧取豪夺之后，只能得到很小的一部分。《纲领》回避剥削制度下这一根本问题，鼓吹“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里和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并由此引出“劳动所得应当属于社会”这样一个完全是维护剥削制度的反动谬论。

我们要问，“劳动所得应当属于社会”，究竟是属于什么社会呢？就拿我们解放前的旧中国来说吧，它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帝国主义控制了我国的经济命脉，对中国人民进行疯狂的掠夺。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反动政府，任意用各种各样的名目，从我们劳动人民身上征收苛捐杂税。地主资本家也依仗他们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各种特权榨取我们劳动人民的血汗。三座大山压得我们抬不起头来，成年累月挣扎在死亡线上，我们劳动人民用血汗创造出来的财富，几乎全被他们掠夺去了。一九四五年解放时，我们大寨的粮食总产量有八万斤左右，广大贫下中农每年每户只有二、三百斤粮食；而少数地富每年每户平均却有上万斤粮食。贫下中农这点

可怜的收入，还得向当时统治中国人民的反动政府交纳苛捐杂税，向地富还债、付利息，劳动人民用血汗创造的财富，大部分被反动政府和地富掠夺去了，剩下的难以维持最低的生活。地富花天酒地，贫下中农挨饿受罪；地富住的是新窑新房，贫下中农住的是夏不遮雨、冬不避风的土窑破房；地富养得肥头大耳，贫下中农饿得骨瘦如柴。不劳动的人占去了大量财富，累死累活的人却几乎一无所有。这种情况不仅是大寨，也不止是中国，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里，哪个国家的统治阶级不是靠我们劳动人民的血汗养肥的？资本主义的德国也不例外。那里的贵族地主和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同样进行残酷的剥削，经过他们的狗食狼吞之后，剩下的一星半点才轮到劳动人民所得。马克思尖锐地揭露了《纲领》回避生产资料所有制，空谈“劳动”和“社会”的荒谬性和反动性之后，讽刺地指出《纲领》所宣扬的**这个论点在一切时代都被当时的社会制度的捍卫者所承认**（第8页）。

至于所谓“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里和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这是《纲领》为了替“劳动所得应当属于社会”的谬论作辩护而炮制出来的。马克思指出，《纲领》所说的“有益的劳动”，是从十八世纪法国

资产阶级思想家卢梭那里抄来的。卢梭从历史唯心主义出发，认为人类的初期，是处在原始状态中，那时不存在劳动；进入社会状态以后才产生了劳动及其有益的作用。《纲领》中“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里和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这种说法是和卢梭的论调一模一样的。马克思在批判这种错误观点时指出：“什么是‘有益的’劳动呢？只不过是能产生预期效果的劳动。一个蒙昧人（而人在他已不再是猿类以后就是蒙昧人）用石头击毙野兽，采集果实等等，就是进行‘有益的’劳动。”（第8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人类的劳动从来都是在一定的社会中进行着的。劳动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有不同的社会性质，这种不同社会性质的劳动反映着不同的生产关系。在奴隶社会是奴隶给奴隶主劳动，在封建社会是农民给地主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工人给资本家劳动，在社会主义社会是劳动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劳动。《纲领》不从社会的生产关系来分析劳动的性质，却玩弄“有益的劳动”这个空洞的概念，这只不过是对劳动人民的一种欺骗。在旧社会，工人给资本家做工，贫下中农给地主扛长工、打短工，他们的劳动是“有益”的还是“无益”的？用“有益”和“无益”的劳动难道能说明资本家和地主对工人、贫下中农的剥削吗？显然，它

不仅不能说明，反而把地主资本家对工人和贫下中农的残酷剥削掩盖起来了。

一切机会主义者也都是剥削制度的维护者。他们挖空心思地进行诡辩，制造各种各样的谬论，妄图掩盖劳动人民受剥削、受压迫的阶级根源，不准劳动人民起来造反。拉萨尔宣扬“劳动所得属于社会”，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辩护；林彪宣扬“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的孔孟之道，为他们变社会主义制度为劳者不获、获者不劳的资本主义制度制造反革命舆论，他们都是工人阶级的可耻叛徒。

## 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消灭私有制

我们都知道，人们要吃、穿、住，就必须进行生产。没有劳动人民的生产活动，人类就不能生存，社会就不能发展。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之间要发生一定的联系，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这种联系，就叫做生产关系。毛主席说：“每个人以社会一员的资格，同其他社会成员协力，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sup>①</sup> 所以

---

<sup>①</sup>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1966年横排本，第1卷第260页。

说，劳动从来都是社会的劳动，孤立的人无法进行生产，孤立的劳动是根本不存在的，当然更谈不上创造财富。同时，孤立的人不能和别人交换思想，因而也不可能创造语言和文化。所以马克思针对《纲领》空谈“劳动”和“社会”的错误，指出：“**劳动只有作为社会的劳动”“才能成为财富和文化的源泉。”**

(第9页)

既然社会的劳动创造了财富，那么，为什么财富会落到少数不劳动的剥削者手里呢？这是因为剥削者掌握了生产资料和国家政权。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生产关系包括三个方面：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关系，产品分配形式。其中，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最为重要，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它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关系，决定产品的分配形式。在封建社会，地主掌握了土地等生产资料，这就决定了地主和农民之间，是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决定了农民生产出来的粮食，绝大部分给地主剥削去。所以，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条件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出来的产品愈多，剥削者也就愈富。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生产力已发展到很高的水平，大机器工业代替了手工业，分工愈来愈细，各生产部门之间的联系愈来愈

密切。社会化的大生产发展了，社会的财富增多了，资本家垄断着生产资料，残酷地剥削压迫广大劳动人民，成为百万富翁，亿万富翁。他们享受着劳动人民创造的物质文化，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广大劳动人民贫穷破产，甚至完全被剥夺了生产资料，成了除自己的劳动力外一无所有的无产者，成了资本主义的奴隶。马克思指出：“**随着劳动的社会性的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劳动之成为财富和文化的源泉，劳动者方面的贫穷和愚昧、非劳动者方面的财富和文化也发展起来。**”（第9页）这是到资本主义社会为止的全部历史规律。

在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生产已达到了空前的社会化，客观上要求它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才能对整个社会的生产实行统一的计划和管理。另一方面，生产出来的大量社会财富却更加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更加突出。这样就使得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家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而作为这个基本矛盾的阶级表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化了。这些矛盾的发展使资本主义社会经常爆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生产出来的大量商品，由于群众的极端贫困而卖不出去，工厂、矿山、银行、商店纷纷倒闭，生

产急剧下降，甚至大量毁掉商品。资本家大批解雇工人，失业人数大量增加。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受到的剥削更加残酷，生活比平时更加困难。这些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根本不可能解决的，要解决这些矛盾只有用革命手段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用社会主义公有制来代替它。这个革命任务历史地落到无产阶级的肩上。无产阶级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经过阶级斗争的锻炼，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武装，完全能够担负起消灭资本主义制度、铲除私有制这个社会祸害的历史任务。马克思说：“**在现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最终创造了物质的和其他的条件，使工人能够并且不得不铲除这个社会祸害。**”（第9页）他还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sup>①</sup>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的发展既为社会主义的诞生准备了物质条件——社会化的大生产，又为自己的灭亡准备了掘墓人——不断壮大的无产阶级。

斗争的实践证明，消灭私有制是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一九四五年昔阳解放以后，我们大寨贫下中农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为铲除私有制这个

---

<sup>①</sup>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1—832页。

社会祸害，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我们用革命的手段打倒了封建地主，完成了土地改革。紧接着我们以“自愿互利、等工等价”的原则，组织了互助组。并在此基础上办起了初级社和高级社，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一九五八年又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二十多年来，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同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些斗争就是为了消灭私有制，巩固和发展公有制。

通过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我们比较清楚地认识到，就消灭私有制说来，在我们国家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还有尚未完成的部分。在工、农、商业中都还有一部分小私有制的残余；在公有制中还存在着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公社集体经济还存在着三级所有。要把三级所有变为公社一级所有，还需要做很大的努力。就是过渡到公社一级所有，也仍然是集体所有制。集体所有制要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只要有两种公有制存在，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就是不可避免的。由于这些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加以限制，不能一下子消除，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的出现就是不可

避免的。如果不加限制，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就会更快地发展起来。我们还认识到，只要有小生产存在，就有滋生资产阶级的土壤。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sup>①</sup>农民虽然在合作化以后走上了集体化道路，但在思想上还程度不同地保留着小生产者的私有心理和旧的习惯势力，一些富裕农民还存在着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而商品制度、货币交换的存在，又时刻诱发着这种私有心理和自发倾向。一有机会有些人就会往资本主义邪路上走。因此，在所有制问题上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还是长期的、尖锐的、复杂的。教育改造小生产者，还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毛主席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说过：“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

<sup>①</sup>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第181页。

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但是，工厂里确有坏人。”“就是说明革命没有完”。毛主席的这段话，不仅说明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而且使我们比较清楚地认识到，在所有制方面还有一个领导权问题。我们不能只看所有制的形式而不看它的实际内容。也就是说，不能只看它挂什么牌子，还要看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还要看掌权人执行的是什么路线。如果领导权解决不好，路线不对头，所有制变过来了，还可能变回去。苏修叛徒集团复辟资本主义就是从夺取领导权开始，从而全面改变所有制的性质的。这是值得我们记取的一个严重教训。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不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彻底铲除滋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为完成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 三、地主资产阶级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

在旧社会，地主阶级剥削压迫了我们劳动人民几千年，是我们劳动人民特别是贫下中农最凶恶的敌人。我们中国人民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地主阶级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把他们打倒，没收了他们的土地，不准他们乱说乱动。不论是民主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地主阶级都是我们的敌人。对于这一点，我们是非常明确的。

但是，《纲领》写道：“在现代社会中，劳动资料为资本家阶级所垄断。由此造成的工人阶级的依附性是一切形式的贫困和奴役的原因。”“现代社会”指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照《纲领》的这种说法，好象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就只存在资本家，不存在地主，土地所有权不是掌握在地主阶级手里，劳动人民也并没有受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地主阶级已不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事实难道真是这样吗？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

我们知道，在封建社会，地主阶级把土地租给农民，收取地租，进行封建剥削。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在农村迅速发展起来，大批农民破产成为无产者。在这种情况下，地主阶级也逐步改变他们的剥削方式。它除了把土地出租给还没有完全破产的小农外，大部分土地则出租给农业资本家，通过向资本家收取地租来剥削农业工人的劳动成果。有的地主自己也开办农场，雇用工人按资本主义方式从事农业生产，剥削农业工人。解放前的旧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差不多。我们大寨的地主，除了在农村雇长工种地，榨取贫下中农血汗外，还把土地租给贫下中农耕种，收取地租。他们还用剥削农民的钱，到城市开工厂，办商店，把农产品运到城市出售，又把工业品运回农村卖给农民，从中牟取暴利。马克思说：“**在现代社会中，劳动资料为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所垄断。**”（第10页）这就是说，地主（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一样，都垄断着劳动资料，都是用他们垄断的劳动资料剥削工人和农民。所以说，地主阶级同样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个剥削阶级，它和资产阶级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

那末，为什么《纲领》不提地主阶级呢？是不是在德国这个资本主义国家里，只有资产阶级，没有地

主阶级呢？也不是的。英国是个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个国家里，**资本家多半不是他的工厂所在的那块土地的所有者**（第10页），就是说，资本家办工厂所占的地基，绝大部分的所有权是属于地主阶级的。老牌的资本主义英国还是这样，刚刚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德国，就更是如此了。当时的德国，地主富农占有全部耕地的百分之九十一，而小农户只占有百分之九。恩格斯指出，在德国，三分之一的劳动者受资本家剥削，三分之二的劳动者受封建地主剥削。德意志帝国反动政府的头子俾斯麦就是一个拥有两万六千公顷（折合三十九万亩）土地的贵族大地主。德意志帝国的全部军政要职，都控制在贵族地主手里。

《纲领》不顾当时德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劳动资料为资本家阶级所垄断”这个谬论，这是机会主义者篡改马克思主义的惯用手法。马克思为第一国际起草的《国际章程》中写道：“**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sup>①</sup>这里虽然没有具体提到劳动资料的垄断者是谁，但在“劳动资料”后面加上“生活源泉”这样的字样，这就表明劳动资料

---

<sup>①</sup>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6页。

不仅包括工厂、矿山，也包括土地、水源。因而，劳动资料的垄断者，不单单是指资本家，也包括地主。

《纲领》炮制者的这种篡改，决不是偶然的疏忽，而是为了追随拉萨尔，推行机会主义路线。拉萨尔早在一八六三年就同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反动政府的头子俾斯麦暗中勾结，大搞肮脏的政治交易。拉萨尔保证不发动工人起义，不用武力反对俾斯麦；反动政府头子俾斯麦则答应给拉萨尔所谓普选权。这就是拉萨尔只攻击资本家阶级，不攻击地主阶级的原因。拉萨尔反对资产阶级是假，维护地主阶级是真。《纲领》炮制者用偷梁换柱的手法，把拉萨尔的黑货塞进《纲领》，是十足的叛卖行为。

我们中国党内的机会主义头子同拉萨尔一样，他们也反对农民起来革地主阶级的命。陈独秀胡说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太革命了”。刘少奇鼓吹“和平民主新阶段”，就是要我们工人农民跟地主资本家和平共处。林彪则狂叫“举逸民”，妄想把被打倒的地主阶级扶植起来。陈独秀、刘少奇、林彪、拉萨尔的这些谬论，证明他们都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

毛主席在同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深刻地指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的社会基

基础,是用封建制度剥削和压迫农民的阶级,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阻碍中国社会前进而没有丝毫进步作用的阶级。”<sup>①</sup>毛主席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还指出,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是这个革命的基本内容之一。全国人民在这条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经过长期的武装斗争,打倒了三大敌人,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一九四五年我们昔阳县解放以后,紧接着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彻底打倒了地主阶级。事实证明,无产阶级要摆脱贫困和被奴役的地位,就必须打倒地主资本家,消灭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必须提出打倒地主阶级,消灭地主的土地所有制的口号,才能把广大农民团结在自己的周围,结成工农联盟,战胜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

在社会主义社会,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并不甘心失败,他们象冬天的大葱,根枯叶烂心不死,总想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

---

<sup>①</sup>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1页。

人，千方百计地想把被打倒的地主和资产阶级扶上台来，用资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 四、社会主义社会总产品的分配 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

拉萨尔鼓吹工人阶级只要争取到“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实现“公平分配”，就能消除贫困，得到解放。《纲领》也贩卖这个黑货。马克思批判了《纲领》的错误，阐明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决定分配形式，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总产品是怎样分配的。

### “分配决定论”是维护和复辟 资本主义的反动谬论

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之间在分配问题上存在着激烈的斗争。一百年前，《纲领》把分配问题放在首要位置，提出许多分配上的要求，说什么“公平分配劳动所得”，“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等等。马克思指出：《纲领》的错误就在于把分配看成并解释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

**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第15页)。这种离开所有制抽象地谈分配,在分配问题上大作文章的反动理论,就是“分配决定论”。一百年后,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大肆鼓吹“分光吃净”,也胡说什么“公平合理的分配是决定社会发展的动力”,这些都是“分配决定论”的翻版。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社会的分配形式都是由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决定的。有什么样的所有制关系,就有什么样的分配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地主资本家垄断着生产资料,工人和农民的劳动成果绝大部分装进了剥削者的腰包。马克思说:**“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第15页)这里所说的生产条件本身的分配,就是指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所以,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把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才能消灭“劳者不获,获者不劳”的现象,才能真正实现“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纲领》贩卖拉萨尔的“分配决定论”,其实质就是引诱工农劳动群众只在分配问题上打圈圈,不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妄图达到他们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反动目的。

《纲领》鼓吹的“分配决定论”，是打着“公平分配”旗号的。对此，马克思用一系列的反问，彻底揭露了它的虚伪性。马克思说：“**难道资产者不是断定今天的分配是‘公平的’吗？难道它事实上不是在现今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唯一‘公平的’分配吗？**”（第10页）谁都知道，在阶级社会里，不同的阶级对“公平”和“不公平”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在旧社会，地主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残酷剥削工人农民。工人农民认为，劳者不获，获者不劳是不公平不合理的；而地主资本家却认为，他们出工钱，工人农民给他们劳动，受他们剥削，是天经地义的事，是公平合理的。刘少奇、林彪这两个复辟狂认为，“分光吃净”是公平合理的，因为这样可以搞垮社会主义经济；而广大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却认为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才是公平合理的，因为这样才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充分说明，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超阶级的“公平”、“合理”是根本不存在的，是骗人的鬼话。拉萨尔妄图用“公平”这个法权概念来决定分配这个经济关系，这从理论上讲也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所以，马克思批判说：“**难道经济关系是由法权概念来调节，而不是相反地由经济关系产生出法权关系吗？**”（第10页）其实“公平分

配”这一反动口号，拉萨尔也是抄来的。在拉萨尔以前，社会主义宗派分子<sup>①</sup>离开所有制关系，主观地想象出各种各样的分配方案，有的主张按劳动、资本和才能三者进行分配，有的主张按能力进行分配。他们的企图就是通过这些方案去调和工人和资本家的矛盾，维护资本主义制度。

《纲领》背叛马克思主义，把“分配决定论”奉为至宝，大加宣扬，这是不能容忍的。“分配决定论”在无产阶级没有取得政权的条件下，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反动谬论；在无产阶级已经取得政权的条件下，是腐蚀劳动人民的革命意志，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谬论。对此必须彻底批判，肃清其流毒。当前，有的人单纯追求高分值、高报酬，不管生产好不好，只看钞票分多少。有的表面上不提高劳动日分值，但采取弄虚作假的办法增加个人收入，减少集体积累。这都是“分配决定论”的影响。我们认为，批判修正主义的“分配决定论”，并不是说分配问题是无关紧要的。马克

---

<sup>①</sup> 社会主义宗派分子是指各种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如法国的圣西门派、傅立叶派、英国的欧文派、工联派等。他们关于“公平的”分配有各种不同的观念，提出不同的方案。这些方案都是空想的、反动的。

思主义告诉我们，所有制形式决定分配形式，而分配形式也反作用于所有制形式，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还会起决定作用。在分配问题上执行什么路线，坚持什么道路，对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巩固和发展，会直接起促进或者阻碍作用。因此，我们要认真学好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原理，认真贯彻执行党在分配方面的方针政策，做好分配工作。

### 总产品分配必须兼顾国家、 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

什么叫社会总产品？就是社会在一年内生产出来的全部产品，包括生产资料（如机器、设备、原料、材料、种子等）和消费资料（如人们在吃、穿、用等方面的物品）。一个大队全年农、林、牧、副、渔等方面的全部产品，是社会总产品的一部分。

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产品应该怎样分配？马克思认为，社会总产品不是“不折不扣”地分给个人，在分配个人消费资料之前，应该进行六项扣除：第一，用来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第二，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第三，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第四，和生产没有关系的

**一般管理费用**；第五，**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第六，**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第11—12页）。以我们生产大队来说，前三项扣除相当于当年生产费用、公积金和储备粮，后三项扣除相当于行政管理费和公益金。如果没有这些扣除，不但不能扩大生产，发展集体经济，就连现有的生产规模也不能维持。把集体的家底都分了，必然出现贫富两极分化，走向资本主义邪路。毛主席根据我国还存在两种公有制的实际情况，总结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提出在社会主义总产品的分配问题上，要从全局出发，**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sup>①</sup>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分配原理的重大发展，是批判修正主义分配路线的强大思想武器。二十多年来，我们大寨大队的总产品分配，始终是按照马克思的分配原则和毛主席的“三兼顾”指示进行的。

在总产品分配中，我们强调首先要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我们的国家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它和我们劳动人民血肉相关。我们贫下中农都懂

---

<sup>①</sup>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得，没有国家的整体利益，也就没有集体的局部利益。要热爱大寨这个小集体，首先必须热爱祖国这个大集体。种田是为了革命，要站在虎头山，眼望天安门，胸怀全世界。二十多年来，不论是丰收年，还是欠收年，我们都如数向国家交纳农业税，从未短欠或受免。为了支援国家建设和世界革命，**备战、备荒、为人民**，我们尽可能多地把余粮交售给国家。虽然向国家交售余粮要取得报酬，属于工农业之间商品交换性质，但粮食是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重要物资，是不是尽可能多地把余粮交售给国家，是生产大队进行总产品分配时必须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一九五九年以来，我们每年向国家交售余粮二十四万斤以上，占粮食总产量的一半左右，每户平均三千斤。一九七二年是历史上罕见的大旱年，我们仍然向国家交售余粮四十万斤，每户平均五千斤，做到了灾年多做贡献。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四年连续大旱了三年，我们共交售给国家余粮一百万斤，创造了历史上的最高纪录。解放以来，我国各地的社社队队，凡是能坚持先国家后集体的分配原则的，都为增加国家的积累，更好地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巩固工农联盟，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不断地提高劳动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分配总产品时，我们还强调要注意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集体经济壮大了，才能高速度地发展农业生产，更好地支援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地改善社员生活，并为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创造条件。为了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我们每年除上缴国家一定数量的农业税外，还扣留当年生产投资、公积金、储备粮、公益金、行政管理费等等，这种做法都是符合马克思关于六项扣除的教导的。关于各项扣留的比例，马克思说：“**应当根据现有的资料 and 力量来确定，部分地应当根据概率论来确定**”。（第11页）这就是说，要根据当年生产状况、现有经济能力和实际需要来确定。既要看到需要，又要注意到可能，同时还要根据过去的经验找出规律，而不是凭主观想象任意确定。为了**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我们在总产品中扣除当年生产投资，即在生产过程中所用的种籽、肥料、农药和农业机械修理费用等等，用了多少，扣除多少。为了扩大再生产还要扣除公积金，用来搞基本建设和购买农业机械。还要留储备粮，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马克思指出：社会总产品中用于生产方面的扣除**在经济上是必要的**（第11页）。公益金是用于社员的福利事业的，例如：办学校、托儿所，合作医疗的开支，赡养五

保户的费用等。行政管理费，就是当年的非生产开支，例如：电灯费、电话费、笔墨纸张费等。马克思说：“**虽然从一个处于私人地位的生产者身上扣除的一切，又会直接或间接地用来为处于社会成员地位的这个生产者谋福利。**”（第12页）这就是说，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是扣除，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则是为人民谋福利。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公共积累是发展集体经济的物质前提，是扩大再生产的来源。在各项扣除中，我们坚持勤俭办社的原则，不断节省非生产性开支，在发展生产的前提下逐步增加公共积累。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我们的公共积累逐年增加，集体经济日益壮大。办合作社初期的一九五三年，公共积累占总收入的百分之四点一，一九七三年增加到百分之二十六。从比例上看增加了五倍多，从绝对数字来看增加了几十倍。现在的公共积累每年有四、五万元，现有固定资产八十多万元。

公共积累的逐步增加，集体经济的不断壮大，为战天斗地，改变生产条件，实现水利化、机械化创造了物质条件。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用自己的公共积累，大搞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狠抓了库、渠、池、

管、旱井五配套，修了十四华里长的“军民盘山渠”，建了一处水轮泵站，把郭庄水库的水引上了虎头山。在虎头山山腰间筑了两个大蓄水池，在地头打了几十眼旱井，把从水库引来的水和雨水蓄起来。经过八年的努力，基本上实现了水利化。遇到天旱，可以利用水渠、水池和旱井里的水浇地，还可以用机器喷灌，这些水利设施效果都比较好，并且已经受了考验。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四年，连续大旱了三年，但是由于基本上实现了水利化，这就有力地抗击了旱灾，获得了连年丰收。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用自己的公共积累，自力更生，大抓了农业机械化。我们架起了高压线，解决了动力问题，碾米、磨面、切脱、粉碎实现了机械化。我们有了汽车、马车、小平车，还架了五条共两千四百多公尺长的高空索道，长途、短途、田间运输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和半机械化。我们有了拖拉机，一半以上的耕地面积可以机耕。农业机械化的逐步实现，加速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近几年来，我们用自己的公共积累，大搞了“人造小平原”。我们以敢于创新的革命精神，用“定向爆破”等办法，先后搬了几十个山头，填平了四、

五条沟，把一、二亩一片的小块地，变成了几十亩一片的大块地，进一步为水利化、机械化创造了条件。

公共积累多了，家底厚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就越来越强了。一九六三年，我们经受住了一场毁灭性的洪灾考验。这年的八月二日至八日连着下了七天七夜大雨，降雨量五百多毫米，等于通常一年的降雨量，造成了严重的灾害。一半以上的庄稼被冲毁，新造的土地几乎被冲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房屋、窑洞裂缝倒塌。山流了，坡滑了，农田道路也断了。在困难面前，我们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靠集体经济的力量，坚持“三不要”（不要国家救济粮，不要国家救济款，不要国家救济物资）、“三不少”（社员的口粮不少，完成国家的粮食征购任务不少，集体储备粮不少），战胜了洪水灾害，做到了一年修复土地，二年恢复产量，三年建成新农村。事实证明，没有巩固的集体经济，是不可能克服这样大的困难的。

集体经济壮大了，社员的福利事业愈办愈好。现在我们办起了高中、初中、小学、幼儿园、托儿所、合作医疗。幼儿园全部费用由大队支付，社员看病，实行合作医疗。社员的住房由大队统一安排修建，个

人每年只出很少的维修费。大队办起了图书馆、阅览室，还组织了业余文艺宣传队、音乐队、体育队，大大丰富和活跃了社员的文化生活。

在总产品分配中，我们强调要树立群众观念，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注意逐步提高社员的生活水平。现在全大队每人每年的实际收入平均一百六十余元，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员户有了存款。社员的口粮满足需要，每人平均五百多斤，绝大多数的社员户有积余。我们大队没有困难户，从合作化以来就没有要过国家的救济款，大队不欠社员，个人不欠集体，家家户户过着不缺吃、不缺穿的幸福生活。

二十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总产品分配问题上，存在着尖锐复杂的两条路线斗争。刘少奇、林彪一伙宣扬“分光吃净”，就是不搞积累，吃掉老本。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变公有制为私有制，造成两极分化，复辟资本主义。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分配原理为武器，批判修正主义分配路线，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三兼顾”指示，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在发展生产的前提下，注意扩大公共积累；在有利于壮大集体经济、扩大再生产的条件下，注意适当改善社员的生活，把总产品分配工作搞好。

## 对商品交换带来的危害要加以限制

一百年前，马克思根据当时欧美有些国家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情况，曾设想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将只有单一的全民所有制，所以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就不存在了。马克思说：“**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它们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第12页）这就是说，在单一的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的社会里，生产出来的产品已不再是商品，产品里的劳动也不表现为价值，而是直接作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因此，总产品的分配中就不要折合成价值、价格等来计算了。

但是，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还存在着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这就决定了还要实行商品制度。因为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之间，人民公社之间，社和队、队和队之间，由于生产资料和产品属于不同的所有者，他们之间的经济

往来，不能由国家直接调拨，直接支配，还必须采取商品交换的方式。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实现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经济联系，巩固工农联盟，还必须保留商品制度，还要发挥商品交换的作用，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保留商品制度的条件下，有些人就可能利用商品交换卖高价，投机倒把，搞资本主义。因此，对商品制度所带来的危害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为了限制商品交换带来的危害，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对重要农副产品分别采取统购统销（如粮食、棉花）、计划收购（如生猪、蛋类）的政策。二十多年来，我们大寨大队在坚决执行国家这些政策规定的同时，对社会上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一九六一年，大叛徒刘少奇利用国家经济暂时困难的时机，竭力推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这条错误路线的影响下，在我们昔阳县也刮起了一股妖风。有些大队就利用这个机会，高价出卖农副产品，捞取额外收入；有些大队，在这股妖风的袭击下，也不得不用高价买自己急需的东西。面对这股妖风，我们大队拿出了一批物资，按正常价格出售，帮助有困难的兄弟队克服了困难，打击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卖高价

的资本主义倾向。例如当时有一个大队，因牲畜无饲草影响春播，他们要以两角钱一斤的高价买我们的谷草。我们说：“大寨如果卖高价，还搞不搞社会主义？”最后我们以一斤谷草三分钱的价格卖给他们一万斤，帮助这个大队度过困难。还有些队趁县城的“八一”物资交流会，在街上卖高价饭，从中赚大钱。我们党支部带领社员群众，连夜磨了五百斤面粉赶做成馒头，到城里去卖，每斤两角钱。这对那些用高价牟取暴利的人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清算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利用商品交换搞投机倒把的现象在昔阳县已受到严格限制。但是，在一些人的头脑里，小生产者的私有观念并没有肃清，他们还会采取别的办法，利用商品制度作为个人或小集体发财致富的手段，以至抓了现钱，丢了路线，助长了资本主义倾向。我们体会到，路线是根本，领导是关键。必须经常不断地教育干部，认识小生产者的私有观念和习惯势力的顽固性，和改造小生产者的长期性、复杂性。要不断向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批判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使他们自觉地抵制商品交换带来的危害。

为了限制商品交换带来的危害，我们还从制度上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

合作化以来，我们大寨在总产品分配方面，特别是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分配给社员消费的那部分，处处考虑到如何有利于巩固集体经济，防止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问题。以分配口粮为例，随着粮食产量的成倍增长，每年除了交公粮、卖余粮、扣除种子、饲料、储备粮外，社员的口粮也在大幅度增长。是多分给社员还是多留集体储备，必须正确处理这个问题。我们在政治挂帅、加强共产主义教育的前提下，在**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指引下，首先发动社员根据本大队的生产发展情况和生活用粮的实际需要，讨论确定全大队的口粮标准。然后每户社员按照自己家庭人口多少、劳力强弱，结合历年用粮的实际情况，自报口粮标准，再通过群众评议，由大队确定。群众把这种办法叫作“自报公议，按需分配”。社员分配的口粮要付款，在年终分配时一次结算。实行这种办法有几个好处：首先，它有利于培养社员的共产主义思想。这种办法是在粮食产量较高（口粮标准达到每人平均五百斤以上）和社员思想觉悟水平较高的条件下实行的，实行这个办法的过程也是对广大社员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过程。因此，它受到群众的拥护和欢迎。其次，它避免了按人劳比例（按人口分配一部分基本口粮，按劳动日分配一部

分劳动粮)分粮造成各户口粮相差悬殊的现象,缩小了社员生活水平的差距。第三,它防止了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人把多余粮食拿到集市上出卖或者搞投机倒把活动,从而限制了商品交换所带来的危害。我们队的各种水果、蔬菜、油料作物以及其他农副产品,有的是根据社员家庭需要适当分配,有的则按收购价格卖给社员,其余部分由大队统一交售给国家。

由于我们时时刻刻都注意同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作斗争,所以我们大寨从来没有人卖过高价粮。我们这些做法在当时虽然并不明确就是限制商品交换带来的危害,现在经过学习,明确了这样做实际上起到了这种限制作用。今后,我们还要更自觉地这样做下去。

## 五、正确贯彻“各尽所能、 按劳分配”原则，限制 资产阶级法权

社会总产品经过各种扣除以后，剩下作为消费资料的部分如何分配，这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马克思深刻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的必然性和局限性。

### 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实行“各尽所能、 按劳分配”的原则是不可避免的

土改后合作化前，我们大寨的生产资料是农民个体私有，一家一户是一个生产单位，除了缴纳农业税外，劳动收入都归各家各户所有，不存在集体如何分配产品的问题。合作化以后，生产资料归集体公有了，分配问题就出来了。怎样分配生活资料，这就得有个办法。二十年来，我们分配给社员的消费品

是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进行的。

“按劳分配”原则是怎么回事呢？马克思说：调节“按劳分配”同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是同一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第13页）。在商品交换的情况下，各种商品为什么能够互相交换呢？这是因为耗费在商品里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相等的。离开这个基础，商品交换就无法进行。所以说，商品交换是由等价交换原则来调节的。而按劳分配就是根据每个人对社会提供的劳动的多少，分别发给报酬。劳动数量和劳动质量不同，得到的报酬也不同。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所以说，在作了各项必要的扣除之后，劳动和报酬之间，实际上也是等量劳动相交换。

虽然按劳分配和商品等价交换一样，通行的是等量劳动和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但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改变了**（第13页）。从内容上看，旧社会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等价交换，是一种商品和另一种商品相交换，甚至劳动力也成为商品；它反映的是私人生产者之间的交换关系，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关系。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则是社会同个人之间劳动同劳

动的直接交换，它反映的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劳动者通过社会分得消费品的分配关系。从形式上看，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里，要使劳动产品成为商品在市场上出售，就要把产品中化费的劳动折算成价值、价格，通过货币形式表现出来。而按劳分配，照马克思的设想，是按照每一个人的劳动情况，给一张证书，证明每个人为社会提供了多少劳动，在分配时凭证领取相当的报酬。

马克思根据社会主义社会已不存在商品生产的设想，认为劳动者可以凭证直接向社会领取消费品，个人得到的报酬，无论在总体上还是具体到每个成员身上，都是等量劳动相交换。所以他说，在按劳分配中，原则和实践不再互相矛盾了。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交换中，原则上要求等价交换，但在实践中，市场上各种商品的价格，由于供求关系的影响，在个别场合价格和价值往往不一致，等价交换的原则往往不能实现。所以说，**等价物的交换只存在于平均数中，并不是存在于每个个别场合**（第13页）。原则上的等价交换，在实践上只能反映一个总的趋势，二者是互相矛盾的。当前，我国还存在商品制度，按劳分配还要采取货币的形式，劳动者得到报酬以后，要通过市场购买个人消费品。这样，在个别场

合,价值和价格还不可能完全一致,原则和实践还有矛盾。当然,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这种矛盾同资本主义社会无政府状态引起的矛盾,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是适应社会主义现阶段生产发展水平和群众的思想觉悟程度的。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 (第12页)。在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变了,生产资料公有了,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不能提供极为丰富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消费品只能按照各人提供的劳动来分配。同时,在社会主义社会,一般说来,劳动还没有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因此,社会在分配消费品时,只能以劳动作为尺度来进行。当然,按劳分配并不是我们的最高理想。我们将来要实现的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随着生产的发展,社会产品的日益丰富,人民群众共产主义觉悟的不断提高,按劳分配必然要逐步过渡到按需分配。

## 在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时，必须对 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

“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体现了“不劳动者不得食”的社会主义原则，它是分配制度的一场深刻的革命，是对几千年来剥削制度的否定。列宁认为“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原则是工人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力求实现的**社会主义的第一个主要根本原则**。<sup>①</sup>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按劳分配还存在资产阶级法权。马克思指出，在按劳分配中，**生产者的权利是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种平等的权利。但是，**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第13页）。

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以后，把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所有制方面的问题已基本解决，但还没有完全解决。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还没有完全取消。在分配方面，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占着统治地位。按劳动量分配消费品的这个平等权利，只是形式

---

<sup>①</sup> 《论饥荒》，《列宁全集》第27卷第365页。

上的平等,并没有消除事实上的不平等,即以劳动作为同一的尺度去计量事实上不同等的人。这种事实上不同等的人表现在:第一,各个劳动者的劳动是不同等的,体力有强弱,智力有高低。按劳分配原则承认劳动能力是个人的“天然特权”,体力强的人,能多劳动,就多得报酬,相反,体力弱的人,少劳动,就少得报酬。这样,在强劳力和弱劳力之间就存在差别,这种差别就是事实上的不平等。第二,各个劳动者负担的家庭人口多少不同,即使在领取同样报酬的条件下,人口少的,生活就好些,人口多的,生活就差些。这种差别也是事实上的不平等。这种形式上平等、实际上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使得有些人生活好些,有些人生活差些,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就会造成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所以必须加以限制。

我们在劳动管理和贯彻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实践过程中,创造了“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分”的办法。通过学习和总结经验,我们认为这种劳动管理办法,对资产阶级法权起了很大的限制作用。

这种劳动管理办法是怎样产生的呢?在这之前,我们大队先后采用过“死分活评”、“定额管理”等办法。这些办法曾起过一定的作用。但是,这些办法

在具体执行时，往往容易只讲“按劳分配”，而忽视“各尽所能”，即忽视对社员提出政治思想方面的要求，容易把人们引向斤斤计较工分。加上农业生产不同于工业生产，各种农活的轻重不容易估透，定额也很难搞准确，这就出现了报酬上的不合理。老实劳动的人不一定能多得报酬，调皮尖滑、不好好劳动的人不一定少得报酬。搞农活定额包工，有些人就可以不顾农活质量，单纯追求完成定额。完成定额以后，余下的时间归他自己自由支配，有的人就去种自留地等，而不能把精力集中在集体生产上。另外，实行“定额包工”，队干部就得把很多时间花费在搞定额和检查验收等具体事务上，挤掉了参加劳动的时间，影响了政治思想工作，而且还出现了“干部算，社员干”的现象，影响了干群关系。能不能找到一个比“定额包工”好一点的办法呢？道路是人走出来的，办法是人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到一九六〇年，在反右倾、鼓干劲的运动中，出现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新高潮，男女老少一齐上阵，战穷山，斗恶水，改天换地，大干社会主义。在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中，许多新工程需要多少工，估不透，摸不准。如果还要按照“定额包工”这套办法搞下去，势必越搞越烦琐，削弱政治思想工作，影响生产，妨碍社员群众社会主义

积极性的充分发挥，妨碍干部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于是党支部就领导社员群众开展了如何评工记分的大讨论，商量用什么办法评工记分好。一位复员军人说：“我们在解放战争中，同蒋介石斗过；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同美帝国主义斗过；那时候只知道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打败美帝，保家卫国，根本不讲什么报酬。现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为什么要斤斤计较工分呢？”这些发言使社员群众受到了很大的启发，一致同意把原来的计酬办法推翻。旧办法推翻了，得有个新办法。社员群众在讨论中提出，每个社员要按照队里的需要，积极干好分配给自己的农活，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好。每天劳动只记出勤日不记工分，到一段农活完成后，大队选出几个思想好、干劲大、技术高、干活最重视质量的社员作为标兵，定出标准工分。社员以此标准，根据自己的劳动情况，报自己可得的工分，然后大家评议。在自报的基础上，公议的前提下，把每个社员每天应得的工分评出来，最后核算登记。十多年来，这种办法愈来愈完善，愈来愈简便。起初一月一评，后来一季一评，半年一评，现在一年一评。这种办法，社员群众很满意，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做“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分”。

十多年来的实践告诉我们，实行“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分”的劳动管理办法，就是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劳动管理，教育社员树立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依靠群众搞好劳动管理。这种办法既扩大了共产主义宣传，又实行了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它的核心是把为革命各尽所能放在第一位，通过劳动管理，用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世界观改造小生产者的私有观念，以适应发展集体经济的需要。这样做就能正确地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有利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实践使我们体会到，实行这种办法是思想上的一场革命。劳动管理，不单单是管人们的劳动，更重要的是管人们的思想，管不好思想，也就管不好劳动。在实行“定额包工”的时候，我们搞得很细，满以为能管好劳动，结果是劳动没有管好，人们计较工分的思想反而更厉害了。人们劳动不是为革命种田，而是单纯为了工分，这就容易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实行这种新办法，首先看一个人是不是为公劳动，然后才评定工分，这就把人的思想引到了正确的道路上，冲破了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毛主席教导我们，**管理也是社教**。这种新的劳动管理办法，由于在自报公议工分时，首先是评劳动态度，所以自报公

议工分的会议，就是最生动、最具体、最直接、最深刻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会议。每次“自报公议工分”都围绕着是否“一心为公劳动”这个中心思想进行，自觉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自我教育，有忆苦思甜，有路线分析，有典型引路，有好坏对比，内容丰富，生动活泼。由于这种教育紧密联系社员的思想实际，所以每进行一次，社员的思想觉悟就提高一步，大大有利于教育老一代，培养新一代，为发展集体经济，正确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奠定了思想基础。一心为公，就是无产阶级思想，共产主义世界观。提倡“一心为公劳动”，就是用无产阶级思想教育、改造农民，树立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社员“一心为公劳动”，就能够做到有多大力量贡献多大力量；能够在劳动当中既注意农活数量，又注意农活质量；能够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同心协力，共同完成任务；敢于对错误思想、不良倾向开展斗争；敢于同阶级敌人斗，同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斗，同修正主义路线斗，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我们认识到：“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是一个完整的原则，不能只讲“按劳分配”而不讲“各尽所能”。“各尽所能”要求我们用共产主义世界观改造自己，

树立共产主义劳动态度。我们现在采用的这种新办法，正是把“各尽所能”提到第一位，并且用“一心为公劳动”这个口号表达了这种共产主义劳动态度的革命内容。“各尽所能”就是在“一心为公”思想指导下，充分发挥每个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尽最大的努力大干社会主义，为革命多作贡献。由于衡量农活质量，既不能见斤见两，又不能见尺见寸，各人是不是把自己劳动潜力都充分发挥出来，劳动的数量和质量究竟怎样，取决于劳动态度，取决于政治思想工作。如果不讲“各尽所能”，不进行共产主义劳动态度的教育，不讲贡献，只强调报酬，不但不能解决好问题，甚至会把社员引到邪路上去。

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还要从各方面设法缩小社员劳动报酬之间和实际生活水平之间的差别。从我们大队的情况看，在实行按劳分配条件下，社员生活水平上的差别，主要是由各户的劳力多少、强弱不同而形成的。新的劳动管理办法摆脱了不必要的条条框框的约束，比较好地做到了凡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可以干力所能及的工作，为集体作出自己的贡献，从而可以取得相应的报酬。全家男女老少都参加劳动了，收入也就增加了。这自然就缩小了社员之间生活水平上的差别。

实行“定额包工”就难作到这一点。有些地方强劳力不愿和弱劳力在一起干活，也不愿意和妇女小孩在一起干活，总怕占了他们的工分。因而经常发生“强劳力干，弱劳力看，妇女老汉靠边站”等浪费劳动力的现象。这都是“定额包工”产生的副作用。由于弱劳力不能出工或少出工，实际收入也就减少，从而扩大了社员之间因劳力强弱不同造成的差别。我们实行了这种新办法后，妇女老汉都能参加自己力所能及的农活。只要一心为公，能干多少，就干多少，这样，就可以使劳力弱、妇女和小孩多的社员户有更多的劳动机会，收入也增加了，和其他社员之间的差别缩小了，同时，也为集体多创造了财富。

实践中我们还认识到，实行这个办法，还可以更合理地评定工分，合理缩小劳动工分等级的差别。由于各人体力不同，实行按劳分配时，承认差别是必要的。但是，过去有些差别不合理，如男女同工不同酬，实际上一部分人占了另一部分人的劳动成果。实行新办法能够更好地根据男女劳力强弱的实际情况，实行男女同工同酬，缩小了男女之间的工分等级差别，使得那些只有女劳力或女劳力多的社员户可以增加收入，改善生活，从而缩小了社员之间生活水平上的差别。

新办法还突破了单纯看当前劳动能力的旧框框,从政治着眼,合理缩小老、少、伤、残的社员和一般社员之间的工分等级差别。对年老体弱的社员,不是只看到他的现在,还要想到他过去为集体出过力。只要他是一心为公劳动,对他的劳动报酬,就要适当照顾。对于刚刚参加集体劳动的知识青年,既要看到他的现在,也要看到他的未来。只要他是一心为公劳动,他的劳动报酬,就可以接近一般青年劳力的水平或只是稍低于这个水平。对于有家务拖累的妇女,在劳动中给她们一定的时间回家给小孩喂奶,提前回家做饭,不减少工分。社员因公牺牲、因公致残,家属无劳力或劳力弱生活有困难的,我们参照本人牺牲前或残废前应得的报酬,分别情况每年给他记一定的工分,给以适当的报酬。这样做,使集体经济既养老,又养小,也养残,充分显示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保障了社员的家庭生活,调动了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逐步扩大了共产主义因素,从而改变了完全依照当前的劳动量来评工计酬的做法,更进一步冲破了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框框。

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还要破除干部的特权思想和等级观念。我们的新办法把干部的劳动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干部都必须以普通劳动者的身分,

和群众一样，一心为公劳动，在评分时也要自报公议。干部每天干什么活，干的怎样，应得多少工分，群众一清二楚。对于干部来说，自报公议工分的过程，也是自我教育的过程，接受群众教育的过程。在评工时，干部带头先评自己的思想，实事求是地自报工分，评自己的家属时，则要先看到缺点，一分为二。他们不讲情面，不搞特殊，以身作则。这样做不仅从制度上堵塞了干部利用职权多得工分的漏洞，而且能使干部真正成为人民的勤务员，亦官亦民。陈永贵同志不论在什么时候，不论工作多忙，都不忘记和社员群众一起参加劳动，只要有一点时间就要到地里劳动。郭风莲同志在接老支书班的时候，也接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班，不管时间多紧，担子多重，身体多累，工作多忙，都不能挤掉她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时间。其他大队干部也都是如此。支书挂了帅，党员跟上来，干部带了头，群众有劲头。十多年来，大队干部已经不要补贴工分了。他们的劳动报酬都不超过同等劳力社员所得的报酬。这样，他们就保持和发扬了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保持和发扬了劳动人民的本色。

在处理分配问题时，在新形势下，我们还采取稳定劳动日分值的办法，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在生

产发展速度较慢的时候，劳动日分值每年都有增加。随着生产发展速度的加快，产品和收入成倍或几倍地增加，这时如仍采用原来的办法，每个劳动日的分值也势必会成倍或几倍地增长，社员之间的收入差别也必将扩大。参照当前城乡广大群众的生活水平，我们近十年来把每个劳动日的分值稳定在一元五角这个水平上。这样做，既能更快地增加积累，发展集体经济，扩大再生产，又避免了社员生活水平之间差别的扩大，限制了资产阶级法权。当然，这种稳定是相对的，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分值还是要逐步提高的。

二十多年的斗争实践使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是在不断向前发展的。对于按劳分配，我们一方面承认它在社会主义阶段是不可避免的，还有它的历史作用；另一方面又要看到在这种分配制度中资产阶级法权还占统治地位，应当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从各方面对它加以限制，否则就会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苏修叛徒集团就是把无限制地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作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手段。他们拚命鼓吹“物质刺激”，用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和花样繁多的各种个人附加津贴，培植了一批新的剥

削者。这些人占有愈来愈多的货币和商品，成为新的吸血鬼，成为苏修叛徒集团的社会基础。而当新的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它的代理人就公开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全盘改变社会主义所有制，全面复辟资本主义。这就是今日苏联社会的现实。林彪一伙竭力追随苏修，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不择手段地掠夺国家的财富，穷奢极欲地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干着各种卑鄙丑恶的勾当。他们不仅表达了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复辟愿望，而且反映了新资产阶级分子和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发展资本主义的反动要求。

毛主席鉴于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严重教训，一贯强调对资产阶级要实行全面专政，对资产阶级法权要加以限制。最近，毛主席作了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要把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对于商品制度、货币交换、按劳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法权，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大发展，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指路明灯。

## 六、为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创造条件

马克思在批判了《纲领》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歪曲以后，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第一次提出了共产主义发展的两个阶段的理论，阐明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和联系，进一步丰富了科学共产主义学说，为我们展示了共产主义的美好远景，激发了我们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热情。

我们现在正处在社会主义社会，我们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有无比的优越性。在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了资产阶级专政，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了生产资料私有制，无产阶级由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变为统治阶级，劳动人民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劳动人民共同创造的财富已不再归一小撮剥削者享受，而是为劳动人民共同所有。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途，保证了

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不可比拟的速度向前发展。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必经的历史阶段，但还不是我们的最高理想。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它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思想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资本主义的痕迹。因此，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任务，就是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不断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方面清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使社会主义取得完全的胜利，进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社会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社会制度，是我们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最高理想。马克思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第14页）这就是说，在共产主义社会，已经彻底消灭了阶级和阶级

差别，国家已经消亡了，全体人民具有高度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具有高度的劳动积极性和自觉性，社会产品极其丰富，实现了“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sup>①</sup>。我们每一个革命者，都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创造条件。

要实现共产主义，必须彻底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包括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消灭反映这些差别的资产阶级法权。那时，全体人民都将成为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这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最根本的特征，也是区别于任何其他社会的根本标志。

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对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作了重大的发展，是造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的光辉道路，是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金桥。毛主席指出：“**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我们大寨大队和

---

<sup>①</sup>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4页。

大寨公社遵循毛主席这一教导，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科学种田，积极发展林、牧、副、渔，大力办起队办工业、社办工业，加强了民兵组织，办起了政治夜校，建立了自己的文化骨干队伍和理论队伍，坚持不懈地批判封、资、修的反动思想，采取各种办法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特别是我们以“五·七”指示为武器，加强了对知识青年的教育，帮助他们克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等剥削阶级旧思想，树立立志农村闹革命的无产阶级世界观。现在，全大队的高初中毕业生全部回乡参加劳动，他们能文能武，个个朝气蓬勃，奋发向上。这些都为逐步缩小以至最后消灭三大差别创造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

在共产主义社会，全民所有制将成为社会唯一的经济基础。这就需要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创造条件，逐步地把较小的集体所有制提高到较大的集体所有制，把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提高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最后再由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万丈高楼从地起”，现在我们正在努力提高生产水平，增加公共积累，巩固发展大队的集体所有制，逐步扩大社有经济的比重，这都是为将来的过渡打基础。

随着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建立，社会生产力

将会发展到一个崭新的水平，文化教育、科学技术高度发展，人们将具有征服自然的巨大能力，将充分利用一切自然资源来为人类社会服务，创造出极其丰富的社会产品。那时旧社会痕迹将最终被清除。消费品的分配将不是以劳动为尺度，而是以人们的需要为尺度，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方面的一切合理需要将得到充分的满足。所以，为了能够创造出极其丰富的社会产品，我们要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大干快上，发展社会主义农业，为国家多作贡献，为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这一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们同旧的传统观念实现了彻底决裂，共产主义思想觉悟、道德品质有了极大提高。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每个人都能无代价地为社会工作，都能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毛主席指出：“**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sup>①</sup>那时，整个世界将出现全新的面貌。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我们的全体干部和广大社

---

<sup>①</sup>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3页。

员正在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学习毛主席著作，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正在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批判孔孟之道，批判私有观念，不断提高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

随着帝国主义和剥削制度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彻底消灭，随着阶级和阶级差别的消灭，国家将自行消亡。现阶段，由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内阶级、阶级斗争还存在，我们必须强化国家机器，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

毛主席根据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还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国际的阶级斗争总是会反映到社会主义国家内部，而国内的阶级斗争又总是和国际上的阶级斗争相呼应的**事实，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理论。毛主席深刻指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毛主席的英明论断清楚地告诉我们，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要实现共产主义社会，需要经过长期的努力，为在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

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而共同奋斗。

我们大寨人常说，只有站得高，才能风格高；只有看得远，才能贡献大。学习马克思关于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以后，我们看到了远景，看到了大目标，心更明，眼更亮，更加坚信共产主义伟大理想一定能实现。为了这个美好的理想，我们决心遵照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坚持以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为纲，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

一百多年来，从外国的拉萨尔、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到中国的刘少奇、林彪之流，这些无产阶级的叛徒对科学共产主义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歪曲和污蔑。他们或是把共产主义歪曲成“土豆烧牛肉”的社会、“福利主义”的社会，或是胡说什么“我们奋斗的集中目的是……大家发财，大家生活得好”、“面包蘸白糖，这就是人民向往的共产主义”等等，真是无耻至极。老牌的机会主义分子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前，就打着“共产主义”的招牌，干着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勾当。现代修正主义者则把列宁亲手缔造的社

会主义国家演变成社会帝国主义。林彪自称想的是“共产主义”，其实他想的、干的都是修正主义、资本主义。他极力扩大三大差别和资产阶级法权，培植新资产阶级分子作为他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但是，蚍蜉撼树谈何易，不管这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家伙怎样张牙舞爪，不可一世，肯定他们没有一个能逃脱身败名裂的下场。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sup>①</sup>历史必将按照马克思主义揭示的规律前进，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

---

<sup>①</sup>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7页。

## 七、农民是工人阶级的 可靠同盟军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sup>①</sup>分清敌我，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是无产阶级革命成败的关键。

《纲领》追随拉萨尔，胡说什么对工人阶级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这就是说，除了工人阶级以外，别的阶级都是反动的。这种说法，把农民、小资产阶级同地主、资产阶级混在一起，都当作敌人来对待，完全混淆了阶级阵线，这是十分荒谬的，是极其反动的。对此，马克思进行了彻底的批判。

无产阶级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是在大工业基础上成长起来的”（第16页），是真正的革命阶级。它受压迫受剥削最深，阶级觉悟最高，革命最彻底。它迫切要求推翻旧社会，砸烂旧世界。它是革命的

---

<sup>①</sup>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页。

领导阶级，肩负着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建设共产主义的伟大历史使命。但是无产阶级在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孤军作战，是不能胜利的。必须根据各种不同的情况，团结一切革命阶级和阶层，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才能战胜敌人，取得革命的胜利。

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中间等级，它包括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等，其中主要是农民。农民特别是贫下中农，深受地主和资本家的残酷压迫和剥削，迫切要求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打倒地主资本家，翻身求解放。

我们大寨贫下中农从我国革命斗争的实践中体会到，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敌人是共同的。农民特别是贫下中农，蕴藏着极大的革命积极性，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马克思非常重视农民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他认为，农民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态度如何，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成败。农民参加了无产阶级革命，工农两大阶级联合起来，革命就能胜利；没有农民参加，革命就会失败。早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毛主席对农民阶级各阶层在革命中的作用，就作了科学的分析。

毛主席指出：贫农“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sup>①</sup>“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sup>②</sup>中农不但能够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并且能够接受社会主义，因此中农可以成为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农民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得到解放，无产阶级只有同农民结成坚固的联盟，才能领导革命取得胜利。

我们大寨贫下中农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了民主革命。在抗日战争时期，虽然我们处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但我们暗地里组织了游击小组，给八路军送情报，送粮食，参加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活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我们积极支援解放战争，要人出人，要粮出粮，要钱出钱。先后有二十多名青年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扛起枪杆，奔赴前线，打击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我们成立了民兵组织，到前方抬担架，救伤员，送军粮，运弹药。我们成立了妇女组织，男人上了前线，妇女在后方努力搞生产，全力以赴地支援解放战争。我们省

---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6页。

②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1页。

吃俭用，节约粮食，多交公粮，支援前线。在战争年代里，所有解放区的贫下中农都是如此。所以说，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实际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假如没有农民参军、参战、出粮、出钱，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吗？能把国民党反动派打败吗？肯定是不可能的。如果按照《纲领》所说的去做，把农民打成“反动的一帮”，能有革命的胜利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农民仍然是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军。我国几亿农民在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下，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就是铁的证明。二十多年来，我们大寨贫下中农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贯彻执行党在农村的阶级政策，实现了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我们依靠集体经济的力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同天斗，同地斗，同阶级敌人斗，同修正主义路线斗，同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斗，较快地发展了农业生产，建设了社会主义新农村，为国家提供了粮食和工业原料。广大农民在党的教导下，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不断改造自己，已经和正在逐步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勇于革命、敢于创新的社会主义新农民。这些事实进一步粉碎了拉萨尔污蔑农民是“反动的一帮”的谬论。所以，在

农业集体化以后，无产阶级专政也必须依靠贫下中农，才能形成巩固的工农联盟，才能办好集体经济，才能有效地镇压和改造一切敌对分子，才能击败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当然，我们还必须看到，农民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他的两重性：作为劳动者，受过剥削，要求革命；作为小私有者，还有保守的一面。今天农民虽然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但在集体所有制还没有提高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以前，在私有经济残余还存在的条件下，还不可避免地保留着原来小生产者的某些固有的特点和习惯。一部分富裕农民仍然存在着资本主义倾向，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还很激烈。因此，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必须坚持改造农民小生产者的思想、心理和习惯，向他们进行耐心细致的宣传教育，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战胜小生产者的习惯势力和保守势力。只有这样，才能巩固社会主义在农村的阵地，不断加强工农联盟。

我们中国的情况是这样，那么德国的情况是怎样呢？是不是当时德国的农民就是反动的呢？不是的。在当时的德国，中间等级还大量存在，农民人口占优势并且有强烈的革命要求。他们为了反抗地主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曾多次起来革命。在地主资

产阶级的残酷压榨下，大批破产农民流入城市，加入了无产阶级队伍。工人和农民有着血肉联系，有着共同的敌人，他们完全能够结成革命的联盟。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同拉萨尔派合并以前，曾同农民合作，跟地主和资产阶级进行过斗争。在一八七四年的国会选举中，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由于得到农民和手工业者的支持，才在选举中增加了议席，取得了一些胜利。既然德国农民是革命的，为什么要把农民打成“反动的一帮”，统统推到地主资产阶级一边呢？这是《纲领》向拉萨尔机会主义路线投降的又一罪证。

拉萨尔所以混淆阶级阵线，把工人阶级以外的其他一切阶级，特别是把农民打成“反动的一帮”，是为了迎合贵族地主阶级的需要，讨好反动政府头子俾斯麦。马克思揭露说，拉萨尔这样做，不过是为了粉饰他同专制主义者和封建主义者这些敌人结成的反资产阶级联盟。（第16页）拉萨尔看到当时德国资产阶级软弱无权，贵族地主阶级掌握着军政大权，而在这两个敌人争权夺利狗咬狗的时候，如果同贵族地主阶级作对，自己就会倒霉；如果站到贵族地主阶级一边攻击资产阶级，既可讨好反动头子俾斯麦，又可以标榜自己是“革命者”。他就是用这种“打击一

大片”的卑劣手法欺骗工人群众，妄图把工人队伍掌握在自己手中。其实拉萨尔反对资产阶级是假，替地主资产阶级效劳是真。这就是拉萨尔把工人阶级以外的其他阶级，特别是把农民打成“反动的一帮”的罪恶目的。

机会主义头子往往采用“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反革命手法，破坏工农联盟，以达到他们维护和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目的。陈独秀说，农民“文化水平低”，“不能参加革命”，把农民运动污蔑为“痞子运动”，“糟得很”，疯狂地加以反对。叛徒王明把农民看作是“最危险的敌人”而加以打击。刘少奇、林彪鼓吹“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孔孟之道，咒骂农民只知道“恭喜发财”、“招财进宝”，只想“油、盐、酱、醋、柴”，不管国家大事。这些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所以要污蔑农民，否定农民，完全是为他们的“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和反动的阶级立场所决定的。在革命胜利前，他们反对农民是为了维护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在革命胜利后，他们反对农民是为了破坏工农联盟，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对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的这些反动言行，必须彻底批判，肃清其流毒。

我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我们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依靠广大贫下中农，不断地批判一部分富裕农民中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同时尽快地实现农业机械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新的基础上，巩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 八、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反对共同的敌人

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发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伟大号召，教育世界各国无产阶级，为了争取彻底解放，必须团结起来，互相支援，共同战斗。但是，《纲领》贩卖拉萨尔的黑货，说什么“工人阶级为了本身的解放，首先是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并提出了“各民族的国际兄弟联合”的机会主义口号，而**关于德国工人阶级的国际职责连一个字也没有提到**（第17页），好象无产阶级革命根本不需要国际无产阶级的相互支援似的。这是以**最狭隘的民族观点来对待工人运动**（第17页），完全背叛了《共产党宣言》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

马克思针对《纲领》的这一错误进行了彻底批判，指出无产阶级首先面临的敌人是本国的资产阶级，它的直接的斗争舞台就是本国，这是不言而喻的（第17页）。但是工人阶级的斗争只是“**就形式来说**”

**是本国范围内的斗争**（第17页）。就内容来说，它就不仅仅局限在本国范围，而是国际范围的斗争了。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打破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自给自足、闭关自守的状况，形成了世界市场和国际资本。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已经越过国界成为国际性的。他们为了维护共同利益，总是相互勾结，共同镇压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和国际工人运动。当时德国宰相俾斯麦就是同沙皇俄国、奥匈帝国结成反革命的三国同盟，共同镇压本国和各国的工人运动。我国的革命斗争历史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中外反动派一向是勾结在一起镇压中国革命的。解放前，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就勾结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使我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总代表国民党的反动头子蒋介石，为了维护他的反动统治，维护帝国主义在华利益，依靠帝国主义的全面支持，发动了长期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内战，用帝国主义的枪炮来屠杀我们劳动人民。解放后，帝国主义并不甘心失败，千方百计地扶植它的代理人，妄想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和侵越战争，妄图包围我国。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在我国边境陈兵百万，多次武装侵犯我

国领土。这些事实说明，在世界范围内，只要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存在，只要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存在，侵略战争和颠覆活动就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就存在。因此，无产阶级面临的敌人，不仅有本国的资产阶级，还有国际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远远超出了一国的范围。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如果不同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就不能战胜强大的敌人。所以马克思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重要条件之一。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理论和实践上一贯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一直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用**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思想教育全国人民。毛主席深刻地论述了解放全人类和解放无产阶级自己，一国社会主义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关系，指出：“**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的义务**”。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站在世界革命的高度来看待我国革命，看待我们的

日常的工作，才会心明眼亮不迷航。我们大寨贫下中农常说，一个大队富了不算富，全国每个大队富了才算富；一个国家的革命胜利了，不算彻底胜利，地球上所有国家的革命胜利了，才算彻底胜利。我国人民在革命斗争中取得的伟大胜利，只不过是向着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迈出了第一步，如果忘记了世界大多数人民还在受剥削受压迫，不再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最后胜利而奋斗，这就意味着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我们要树立起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战斗到帝、修、反灭亡，革命到全人类解放。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有着鲜明的阶级性。《纲领》用“各民族的国际兄弟联合”这个机会主义口号，偷换各国工人阶级在反对各国统治阶级及其政府的共同斗争中的国际兄弟联合（第17页）这个革命原则，这种做法是非常反动的。毛主席教导我们：“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在阶级社会里，民族内部是划分为阶级的。《纲领》所谓“各民族的国际兄弟联合”，是各民族的资产阶级的联合呢，还是各民族的无产阶级的联合？它不提无产阶级的联合，不提联合的目的是反对资产阶级，这就完全抹煞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阶级内容。《纲领》用

含糊不清的词句，把国际主义变成连剥削阶级也可以接受的超阶级的空洞口号，实际上是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取代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是新老机会主义者惯用的手法。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二国际<sup>①</sup>修正主义头子们打着“保卫祖国”的破旗，大搞民族利己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麻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志，妄图把无产阶级革命引向邪路。苏修叛徒集团口头上喊着“国际主义”的动听词句，实际上干的是帝国主义的罪恶勾当。他们大搞侵略扩张，大搞霸权主义，到处伸手，到处进行颠覆活动，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刘少奇一伙竭力追随苏修叛徒集团，鼓吹“三和一少”（对帝、修、反要和，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的支援要少）的修正主义路线，背叛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林彪反党集团丧心病狂，叛国投敌，妄图把我国变为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他们是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奴才和走狗，是拉萨尔和新老修正主义的徒子徒孙。我们要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同全世界一切真正的马

---

<sup>①</sup> 第二国际(1889—1914)，是社会主义政党的国际联合组织，早期在恩格斯领导下起过积极的革命作用，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领导权落入修正主义者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第二国际的首领们支持帝国主义战争，背叛无产阶级利益，因此彻底破产。

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团结在一起，把反帝反霸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我们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当前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时代没有变。列宁提出的关于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and 策略，仍然是我们今天指导思想理论基础。列宁多次指出，帝国主义就是侵略，就是战争。现在第三世界已经进一步觉醒壮大，它在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斗争中加强了团结，成为反帝反霸的主力军，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动力。第三世界同欧洲、北美、大洋洲人民的正义斗争，互相支持，互相鼓舞。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我们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加强同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团结，加强同一切受帝国主义侵略、颠覆、干涉、控制和欺负的国家的团结，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坚决支持第三世界人民反帝反殖反霸的斗争，努力为支援世界革命做出贡献。“身在田间闹革命，志在世界一片红”，“建设虎头山，埋葬帝、修、反”，这是我们的战斗口号。我们有了这样的思想，就能站得高，看得远，干起活来有力量，就能把我们所干的一切都和支援世

界革命紧密联系起来。我们牢记毛主席的**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都是互相支持的**这一教导,把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都看成是对我们的有力支持,把他们的胜利,看成是我们的胜利。我们要用多打粮食、多卖余粮的实际行动支援世界革命。我们坚决贯彻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为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为在地球上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而共同奋斗!

## 九、用革命手段消灭 雇佣劳动制度

《纲领》贩卖拉萨尔的黑货，提出废除“铁的工资规律”，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马克思彻底批判了这个谬论，指出：工人阶级要摆脱贫困和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必须用革命手段消灭雇佣劳动制度。

拉萨尔说，在资本主义社会，每个工人的平均工资，始终停留在维持本人及其家属最低的生活水平上。如果工资高于这个水平，工人生活就好一些，结婚的也就多了，人口繁殖就快了，出卖劳动力的人就增加了，工人的工资就会降下来；如果工资低于这个水平，工人生活就困难，结婚的就少了，人口繁殖就慢了，出卖劳动力的人就短缺了，工资又会回升到这个水平。所以，由于工人人口的增加或减少，工人总是只能得到最低限度的工资，这就是拉萨尔所说的“铁的工资规律”。按照这种说法，工人生活之所以贫困，是由“铁的工资规律”造成的。

只有废除了“铁的工资规律”，工人生活才会富裕起来。

马克思指出，拉萨尔贩卖的所谓“铁的工资规律”，是以英国资产阶级反动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为论据的。马尔萨斯胡说什么人口是按1、2、4、8、16……这个几何级数成倍增长的，而生活资料是按1、2、3、4、5……这个算术级数一点一点增长的，劳动人民所以贫困，是因为生活资料的增长速度赶不上人口的增长速度。要消除贫困，只有用战争手段或造成瘟疫的办法，消灭一部分人口。长期以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正是拿这个反动的人口论作根据，来证明工人阶级的贫困是这种所谓自然的人口规律造成的，证明社会主义社会不但不可能消除这种贫困，反而会使它更普遍，更严重。

拉萨尔用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作为“铁的工资规律”的论据，其反动实质就是反对工人阶级起来革命，维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马克思说：“如果这个理论是正确的，那末，我即使把雇佣劳动废除了一百次，也还废除不了这个规律，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规律不仅支配着雇佣劳动制度，而且支配着一切社会制度。”（第19页）然而我们都知道，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里，根本没有雇佣劳动制度，

也就谈不上工资制度和工资规律。显然，拉萨尔这个谬论无非是想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斗争是没有意义、没有前途的。因为，按照他的说法，“铁的工资规律”是由不可抗拒、不可改变的自然规律决定的。

毛主席在驳斥反动的人口论时指出：“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象马尔萨斯者流所谓食物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谬论，不但被马克思主义者早已从理论上驳斥得干干净净，而且已被……中国解放区的事实所完全驳倒。”<sup>①</sup>我国解放二十多年来，人口增长百分之六十，而粮食增长了一倍以上，做到了人人有工作、有饭吃、有衣穿，生活不断改善。拿我们大寨来说，解放前全村二百五十多口人，粮食总产量最高不过八万斤。到一九七三年，人口增加到四百七十多，粮食总产量增加到七十七万多斤。解放后二十多年来，人口增长还不到一倍，粮食产量却增长了八倍多，农、林、牧、副、渔得到了全面发展，穷大寨变成了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大寨。这个事实说明：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

<sup>①</sup>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48—1449页。

来。<sup>①</sup>当然，这里必须指出，目前我国实行的计划生育，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的需要。它有利于妇女的彻底解放，有利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有利于保护妇女、儿童的健康，这同马尔萨斯的反动人口论是根本不相干的。

事实上，“铁的工资规律”是根本不存在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贫困化的根源，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雇佣劳动制度，资本主义的工资制度不过是雇佣劳动制度的产物。如果挖掉了雇佣劳动制度这个老根，资本主义的工资制度和工资规律当然也就完蛋了。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我废除了雇佣劳动，那末我当然也废除了它的规律，不管这些规律是‘铁的’还是海绵的。”（第18页）在这里，马克思给工人阶级指明了革命的道路：只有用革命手段消灭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工人阶级才能摆脱贫困和被奴役的痛苦。

马克思为了彻底批判拉萨尔的谬论，再次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指出旧社会的工人所以贫困，不是因为有什么“铁的工资规律”，而是由雇佣劳动制度造成的。

---

<sup>①</sup>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49页。

过去在我们昔阳这个地方，地主资本家开了一些煤窑，完全采用手工劳动。我们的大队长贾承让和贫协主任贾进才就在煤窑里干过活。资本家为了多赚钱，根本不顾工人死活。挖煤工人天不亮就出工，到半夜才能回家，每天劳动十二个小时以上。每四个人搭伙一班，每天必须挖出八千四百多斤煤，值五斗六升玉米。除去生产中消耗掉大约八升玉米价钱的一点灯油和工具费外，四个工人每天创造了相当于四斗八升玉米的新价值，平均每人一斗二升。可是，每个工人的工资一天最多只有二升玉米，其余全被资本家白白拿走了。每个人被资本家拿走的一斗玉米，就是剩余价值。

上面的事实说明：工资只是工人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工人新创造的价值比资本家给工人的工资大得多。可见工资并不是劳动的价值，因为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并没有全部给工人。劳动能创造价值，但它本身没有价值。劳动和劳动力不是一回事。劳动是劳动力的使用，而工人出卖给资本家的只能是自己的劳动力，当工人进到煤窑以后他的劳动属于资本家，由资本家支配了。工资是劳动力的价值，它是相当于用来养活工人及其家属所必需的最低生活资料的价值。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是

为了维持工人能够不断地出卖劳动力。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给资本家干活，资本家给工人工资，干一天活给一天工资，而且工资是在劳动之后给的，这样就造成一种假象，好象全部劳动都得到了报酬。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就利用这种假象，硬说工资是劳动的价值或价格，是工人劳动的全部报酬。他们胡说什么工人劳动所创造的一切，资本家又以工资的形式全部给了工人。资本家同工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买卖关系，谁也没有剥削谁。这显然是别有用心 的欺骗。马克思揭穿了资本家的欺骗，精辟地指出：“**工资不是它表面上呈现的那种东西，不是劳动的价值或价格，而只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的掩蔽形式。**”（第19页）这就深刻地揭露了工资的本质和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

挖煤工人受剥削的事实说明，被资本家剥削去的剩余价值是工人的无偿劳动创造的。工人一天劳动十二小时，实际上分两部分：一部分为自己劳动二小时，资本家给了二升玉米的工资，所以称为有偿劳动。另一部分是为资本家劳动十小时，相当于一斗玉米的价值，所以称无偿劳动。资本家就是靠占有工人的无偿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而发大财、赚大钱的。所以马克思深刻指出：“**雇佣工人只有为**

资本家(因而也为他们的剩余价值的分享者)白白地劳动一定的时间,才被允许为维持自己的生活而劳动,就是说,才被允许生存;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中心问题就在于:用延长劳动日的办法,或者用提高生产率、从而使劳动力更加紧张的办法等等,来增加这个无偿劳动。”(第19页)在这段话里,马克思进一步揭示了资本家榨取更多剩余价值的两种基本方法:

一种是延长劳动时间的办法。比如一个挖煤工人的工资仍为二升玉米,有偿劳动时间仍为二小时。但资本家把每天劳动时间由十二小时延长到十四小时,无偿劳动时间就由十小时增加到十二小时,剩余价值就由一斗增加到一斗二升。可见,工作日越长,无偿劳动时间越长,剩余价值也就越多。

另一种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办法。比如挖煤工人每天劳动时间不变,仍是十二小时,但因为这个煤窑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也就是产量增加了一倍,资本家付给工人的二升玉米工资,原来需要两小时才能生产出来,现在只要一小时就生产出来了。因此,工人的有偿劳动时间就由原来的两小时,缩短到一小时,而无偿劳动时间就由十小时增加到十一小时。如果其他情况没有变化,这个资本

家得到的剩余价值就从一斗玉米，增加到二斗二升玉米。

资本家就是贪得无厌地追求剩余价值，他们是一群吸血鬼，只要劳动者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时，他们是决不肯放手的。为了多赚钱，他们恨不得从工人的骨头里榨出油来。结果，资本家越来越富，工人越来越穷，正象马克思指出的那样：**雇佣劳动制度是奴隶制度，而且社会劳动生产力愈发展，这种奴隶制度就愈残酷，不管工人得到的报酬较好或是较坏**（第19页）。

马克思的科学的工资理论和剩余价值学说，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是工人阶级贫困和受剥削受压迫的根源。但是，《纲领》背叛了马克思主义，根本不提消灭雇佣劳动制度，反而鼓吹拉萨尔的什么“铁的工资规律”，妄图把工人运动引向邪路。这是地地道道的机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虽然有重要意义，但它不能使工人从根本上摆脱被剥削被奴役的地位。工人阶级要获得彻底解放，只有把经济斗争发展为政治斗争，用革命的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工人应当摒弃‘做一天**

**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这种保守的格言，  
而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  
动制度！’**”<sup>①</sup>

---

<sup>①</sup> 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3—204页。

## 十、暴力革命是推翻资本主义 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

通过什么道路推翻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斗争的一个焦点。《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无产阶级要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sup>①</sup>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革命实践证明，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唯一道路。《纲领》背叛马克思主义，追随拉萨尔，鼓吹什么通过“议会道路”实现社会主义。它胡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只需争取到普选权，把自己的代表选进资产阶级的议会，“在劳动人民的民主监督下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而这些合作社一经普遍建立起来，“便从它们里面产生出调节总劳动的社会主义组织”，这样，社会主义就实现了。这是一条货真价实的机会主义路线。所以马克思讽刺地说：“**这真不愧为拉萨**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5页。

**尔的幻想：靠国家贷款能够建设一个新社会，就象能够建设一条新铁路一样！”（第20页）**

无产阶级通过议会道路能不能掌握国家政权呢？地主资产阶级国家能不能拿钱帮助劳动人民实现社会主义呢？答案是：绝对不能！我们大寨老一辈的贫下中农，都是从旧社会的死亡线上挣扎过来的。我们从自己的血泪史中深刻地体会到，反动派掌权的国家是压迫劳动人民的工具，它把我们当牛马看待，千方百计地对我们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在旧社会，我们大寨的政权掌握在阎长手中，当阎长的都是家中有几百亩土地的财主。地主富农掌握了基层政权，就强迫农民给他们交租交息，竭力维护他们那个阶级的利益。又如，给反动政府交粮纳草支差时，有钱有势的地富少交粮，少纳草，少支差或不支差；缺吃少穿的贫下中农反而要多交粮，多纳草，多支差。这本来不公平，但是哪里有说理的地方！因为剥削阶级的国家政权上下是一股黑根，一个鼻孔出气，谁说个不公平，就以抗粮抗差治罪。反动政府的基层政权就是这样，而要这样的反动国家帮助我们实现社会主义，岂不是天下奇闻！再说，资产阶级议会只不过是虚伪的自由民主欺骗劳动人民的一个装饰品。要地主资本家掌权的国家帮助劳动人民

实现社会主义，就等于要他们交出政权，放弃剥削，地主资本家肯这样干吗？难道资产阶级会愚蠢到自己切断自己的脖子吗？所以，不论是“议会道路”还是“国家帮助”，统统是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反动谬论，目的在于麻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志，让劳动人民服服贴贴地当地主资本家的“顺民”。解放前，国民党反动派的头子蒋介石利用他的反动军队，疯狂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劳动人民。他们不是也玩弄过召开伪“国民大会”的花招吗？但是，他们没有一天不“剿共”，没有一天不反人民。再拿德国来说，反动政府头子俾斯麦控制下的德意志帝国议会也同样是粉饰门面的东西。工人即使把自己的代表选进议会，也只是一种陪衬。他们虽然能够对反动派进行一些揭露，对群众进行一些宣传，但根本改变不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性质。事实上，一八七八年，即《纲领》通过后第三年，反动政府就悍然颁布了反社会党人法，动用警察、军队等国家暴力机器，疯狂镇压工人运动，逮捕大批社会民主党人，把他们投入监狱。试问，德国无产阶级从这样的反动政府那里能得到什么“国家帮助”？这样的国家难道能帮助德国无产阶级建立社会主义？这真是弥天大谎。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只能从社会的革命转变过程中产生出来，

就是说，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没有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没有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就没有社会主义，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既不是靠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国家帮助”，也不是靠骗人的伪“国民大会”的选举，而是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靠枪杆子打出来的。我国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整整进行了二十多年的武装斗争，才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打倒了蒋家王朝，推翻了三座大山，夺取了全国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并依靠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没收了官僚资本，进行了土地改革，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把生产资料私有制变成了公有制。这个事实是对拉萨尔及其门徒们所鼓吹的“国家帮助”谬论的最有力的批判。

《纲领》为了给“国家帮助”的黑货遮羞，还胡说什么把“国家帮助”置于“劳动人民的民主监督之下”。这是极其无耻的手法。在德国，无产阶级连丝毫的政治权利都没有，占劳动人民大多数的农民分散在农村，仍然处在封建地主的压迫和奴役之下，根本

谈不上对地主资产阶级国家实行什么“民主监督”。同时所谓“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既然《纲领》要劳动人民向地主资产阶级国家乞求帮助，那就表明劳动人民既没有当家作主，也没有成熟到可以当权的程度。如果他们已经觉悟到自己要当权，那他们就一定会起来革命，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而决不会向反动国家乞求帮助。因此，所谓“劳动人民的民主监督”，实际上只是一句骗人的空话。

《纲领》鼓吹要求“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实际上是为了讨好普鲁士王朝，对抗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学说，破坏德国工人运动，把它引到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邪路上去。当时在欧洲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确出现过生产合作社这类组织，但那是这些国家的工人想通过建立合作社的办法来摆脱受剥削的处境。这反映了工人要求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争取变革现存的生产条件的一种愿望。它同《纲领》所鼓吹的“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毫无共同之处。马克思对工人自己办的这种合作社给予应有的评价，说它是可贵的，但同时又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单纯靠建立合作社来实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它根本不能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生产资料私有制，因为社会主义公有

制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在资产阶级专政下自发地产生出来。只有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才能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因此,过分夸大资本主义社会中搞合作运动的作用,认为不必用革命手段夺取国家政权就能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路线。

一百多年来,特别是半个世纪以来,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经验一再证明,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是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根本原理。机会主义头子所鼓吹的“国家帮助”、“议会道路”、“和平过渡”等等谬论,都是背叛这个根本原理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总结了国际国内革命斗争经验,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英明论断。毛主席指出:**“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sup>①</sup>毛主席又强调指出:**“革命的中**

---

<sup>①</sup>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8—309页。

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sup>①</sup>毛主席的这些论述，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对无产阶级革命具有极其伟大的意义。

---

<sup>①</sup> 《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06页。

## 十一、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 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sup>①</sup>**，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但是《纲领》却贩卖拉萨尔的反动观点，胡说德国党的奋斗目标是什么“力求用一切合法手段来争取自由国家”。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歪曲，是对无产阶级的背叛。

国家是什么东西呢？历来的剥削阶级及其代言人总是掩盖国家的阶级实质，把他们所掌握的国家政权说成是超阶级的、为一切人服务的、“仁慈”的东西。拉萨尔就是超阶级国家观的鼓吹者。他胡说什么国家的基本任务是教育全人类，引导社会走向自由和进步，没有什么阶级压迫阶级的问题。他还吹捧当时的普鲁士王国，说它能代表全民利益；无产阶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2页。

级只要争取到普选权,把自己的代表选进议会,就能使这个国家变成“自由国家”。马克思非常愤慨地指出:“使国家变成‘自由的’,这决不是已经摆脱了狭隘的奴才思想的工人的目的。”(第21页)恩格斯也指出:“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第35页)弄清革命导师对拉萨尔的批判,对于了解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实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很有意义的。

那末世界上到底有没有自由国家呢?根本没有。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国家并不是人类历史上从来就有的。社会出现了阶级,有了阶级斗争,才产生了国家。国家从来就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奴隶制国家是奴隶主压迫奴隶的工具。封建制国家是地主压迫农民的工具。资本主义国家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工具。社会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压迫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剥削阶级的工具。所不同的是,它不是少数剥削阶级压迫多数被剥削阶级的工具,而是多数被剥削阶级压迫少数剥削阶级的工具。毛主席指出:“军队、警察、法庭等项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对于敌对的阶级,它是压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并不是

什么‘仁慈’的东西。”<sup>①</sup>所以，从来就没有超阶级的“自由国家”。

既然没有“自由国家”，那末《纲领》所鼓吹的“自由国家”是什么货色呢？恩格斯指出：“从字面上看，自由国家就是可以自由对待本国公民的国家，即具有专制政府的国家。”（第35页）当时的德国，实行的就是可以自由地压迫和奴役人民的专制制度。这一点，旧中国也和德国一样，不论是“大清帝国”，还是“中华民国”，都是可以自由地压迫和奴役劳动人民的。那时候只有封建地主的自由，只有资产阶级的自由，哪里有劳动人民的自由？在旧社会，我们大寨贫下中农处处不自由，劳动不自由，吃饭不自由，住房不自由，说话不自由，就连过春节闹个红火热闹也不自由。事实很清楚，剥削阶级的国家愈自由，劳动人民遭受的压迫剥削就愈残酷。拉萨尔鼓吹“自由国家”的真实目的，就是维护德国地主资本家的专制政府，让它自由地压迫剥削劳动人民。

阶级斗争的历史使我们认识到，自由是有阶级性的。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sup>②</sup>根

①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13页。

②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本不存在什么全人类的、超阶级的自由。在有阶级压迫的地方，在存在阶级压迫的工具——国家的条件下，统治阶级不会允许被统治阶级有自由。只有彻底消灭了阶级和阶级压迫，才能有真正的自由。马克思指出：“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站在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第21页）这就是说，到国家变成了完全服从社会的机关的时候，国家不存在了，那时才有真正的自由。

资产阶级的国家不是“自由国家”，无产阶级建立起来的国家，也根本不是什么“自由国家”。无产阶级用暴力革命打碎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之后建立起来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它是无产阶级用来镇压一切剥削阶级的反抗，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工具。因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要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所以马克思明确地指出，在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而绝对不是什么“自由国家”。

苏修叛徒集团上台以后，打出了“全民国家”的旗号。实际上，他们的国家决不是什么“全民”自由

的国家，而是货真价实的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实行专政的国家。毛主席指出：“**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所谓“全民国家”，是苏修法西斯专政的“遮羞布”。他们的国家机器同当年的沙皇俄国一样，是对内血腥镇压人民，对外进行侵略扩张的工具。

《纲领》把国家和社会割裂开来，认为国家可以离开社会的经济基础独立存在，说国家有它自己的独立本质，有它自己的“精神的、道德的、自由的基础”，并从这个观点出发，把普选权、直接立法权、人民权利等等作为国家的自由的基础，把平等的国民教育、科学自由、信仰自由等作为国家的精神和道德的基础，这都是十分错误的。

马克思告诉我们，国家属于上层建筑，它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的经济基础之上、反过来又为其基础服务的。在解放前的旧中国，**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他们当权的二十年中，已经集中了价值达一百万万至二百万万美元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sup>①</sup> 这个垄断资本主义，同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

---

<sup>①</sup>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7页。

旧式富农紧密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就是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而国民党的反动政权就是为帝国主义、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服务的。只有了解旧中国的社会经济基础和阶级关系，才能认清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本质。因此，社会才是国家的基础，离开社会的性质，不看一个政权为哪些阶级服务，就看不清国家的性质。

《纲领》对资产阶级国家和资本主义社会不作阶级分析，把它笼统地称为“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这也是十分错误的。马克思指出，所谓“现代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所谓“现代国家”，就是资产阶级国家。虽然这些国家有各种不同的统治形式，如德国是军事专制制度，英国是君主立宪制，瑞士和美国是民主共和制，但它们都是建筑在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上，本质上都是资产阶级专政。毛主席指出：“**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sup>①</sup>看一个国家，不要只看它叫什么名字，采取什么形式，更重要的是看它建立在什么社会经济基础之上，是哪个阶级的专政。苏修

---

<sup>①</sup>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6页。

叛徒集团仍旧把他们的国家称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实际上他们已经全面复辟了资本主义，把苏联变成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帝国主义国家。

《纲领》离开资本主义社会空谈“现代国家”，其目的就是要掩盖德意志帝国的反动本质，以便向它提出一些民主要求。马克思指出，《纲领》所提出的民主要求，除了属于空想的以外，都已经在瑞士、美国这些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里实现了。但是，当时的德国，却是一个军事专制制度的国家。在德国这种条件下提出这些政治要求，这说明他们连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都不如。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毕竟还要求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纲领》连这个要求也不敢提出来，反而幻想军事专制制度会赐给他们民主自由，这是**警察所容许而为逻辑所不容许的**（第24页）。因为《纲领》保证不推翻德意志帝国，这是官方警察所容许的。然而，从逻辑上说，在军事专制制度的条件下绝对不可能有劳动人民的民主和自由。

《纲领》提出，“通过国家来实施普遍的和平等的国民教育。实施普遍义务教育。实施免费教育”等等。这也是极其荒谬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教育是被资产阶级所垄断，并为它的利益服务的，决不可

能对一切阶级都平等。在旧社会，“地富子弟进学堂，穷人儿女放牛羊”。劳动人民终年劳累，连肚子都吃不饱，哪里有钱供给子女上学。解放前，我们大寨的贫下中农，连一个小学毕业生也没有。全村只有一所小学校，还被地主富农霸占着，贫下中农子女根本没有上学的权利。有一次贫农的孩子牛国栋在学校门口听了听，就被连打带骂地赶走了。这哪里有什么平等的国民教育！所谓“通过国家来实施国民教育”，这是想让专制制度的国家来充当人民的教育者，让它用警棍、枪炮、监狱以及反动腐朽的思想来“教育”人民。马克思针锋相对地指出：在德意志帝国，**倒是国家需要从人民方面受到严格的教育**（第25页），这就是说，不应该让反动国家来教育人民，而应该发动人民起来革命，彻底砸碎它。

总之，《纲领》鼓吹用合法手段争取“自由国家”，空谈“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无耻地向专制帝国提出民主要求，这是对劳动人民的欺骗，是十足的机会主义。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整个纲领，尽管满是民主的喧嚣，却彻头彻尾地感染了拉萨尔派的对国家的忠顺信仰。”**（第25页）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千万不能听他们这一套，而要明确地认识到地主资产阶级国家是压迫人民的，它绝对不会给人民自

由民主。劳动人民要从剥削者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只有拿起枪杆子，推翻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砸烂反动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 十二、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 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在批判了《纲领》鼓吹的“自由国家”的谬论以后，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第22—23页）马克思的这个科学论断，为无产阶级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指明了前进的道路。

### 无产阶级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

为什么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非经过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不可呢？为什么这个时期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呢？

我们认识到，无产阶级的最终目的，是要彻底消

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但是，这个目的不是一下子就能达到的，这中间还有很长的一段路程。因为无产阶级用暴力革命夺取国家政权以后，还不能立即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更不能马上建立起共产主义社会，而要经历一个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这个时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说：“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sup>①</sup> 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sup>②</sup> 马克思的这两段话，明确地指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部历史任务和实际内容。要消灭这四个一切，就只有

---

<sup>①</sup> 《马克思致约·魏德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2—333页。

<sup>②</sup>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9—480页。

在一切领域和一切阶段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除此以外，没有别的道路。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个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sup>①</sup>可见，这个时期的阶级斗争必然是空前残酷，空前尖锐复杂。要彻底战胜资本主义，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

通过学习，我们认识到，无产阶级所以要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首先是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被打倒的剥削阶级决不甘心他们的失败，每日每时都在阴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梦想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社会主义革命每前进一步，他们都要跳出来反抗，一有机会就猖狂进攻。这种反抗或进攻，在政治思想战线上有，在文化教育战线上有，在经济战线上也有，总之，在一切领域都有。我们大寨由初级社向高级社过渡的时候，地富分子煽动说，“这一下可把草料簸箕端啦”，“豆子

---

<sup>①</sup>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碾了皮，只留下光仁(人)啦”，妄图破坏合作化。生产资料由私有制变为集体所有制以后，阶级敌人疼得要死，恨得要命。有一个反革命分子为了反攻倒算，竟然装疯卖傻，手持钢刀，企图杀害干部，并大喊大叫要贫下中农给他腾房，真是狂妄至极，反动透顶！随着社会主义革命不断深入，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不断提高，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强大，阶级敌人也在不断地变换他们的破坏手法，越变越隐蔽，越狡猾，越阴险。

其次是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还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因此，不对资产阶级实行长期的全面的专政，便不能最后战胜他们。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农民是小生产者。合作化后，他们虽然已变成了社会主义集体农民，但是在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还没有提高到全民所有制以前，在私有经济还没有完全消灭的时候，农民还在不同程度地保持着原来小生产者的某些固有特点。特别是一部分富裕农民还存在着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他们时刻想着个人发家致富，一有机会就要向资本主义的邪路上走。我们大队有个社员，是干木匠活的，他利用

这一点手艺和邻村一些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人拉扯在一起，搞资本主义活动，从中捞取私利。这种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是产生资产阶级的土壤。因此，改造小生产者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毛主席在谈到小生产是经常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时，强调指出：“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在我们农村党员干部中，也会产生蜕化变质分子和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我们县有个大队支部书记，由于小生产者的思想没有得到很好改造，受了资产阶级的腐蚀，走上了资本主义邪路。他把自己所在的大队当作私人的地盘，称王称霸，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最后发展到包庇坏人，欺上压下，化公为私，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腐化堕落。事实说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所有制已基本解决以后，还有一个领导权问题，就是说，公社、大队、生产队的领导权，是否真正掌握在马列主义者和贫下中农手里。我们不能只看他挂的牌子，还必须看他的实际内容。我们不能只听他怎么说，更重要的是看他怎么做。有些干部打着搞社会主义的招牌，实际上搞资本主义活动。有的把国家财

产变为大队所有，实际上是损大公肥小私；有的以搞副业为名放下农业生产不管，把劳力、畜力、车辆放出去抓现钱；有的不顾生产发展情况，一意追求劳动日的高分值，多分配，少积累，甚至“分光吃净”。领导权掌握在这些人手里，集体经济就有可能由社会主义变为资本主义，这些人就有可能变为新资产阶级分子。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将在一部分党员和干部中滋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对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我们必须坚决批判和斗争，对资产阶级必须实行全面专政。

毛主席在谈到社会主义制度时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社会主义社会的货币，也是商品交换的媒介。如果不对货币交换和商品制度中的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就会给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产生开了绿灯。一九六七年，我们昔阳县的二十万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开展了群众性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农业连年大丰收，粮食产量大幅度上升，三年翻了一番，五年翻了两番，集体和社员手中的粮食也就多起

来了。这时，有些大队干部和社员就用粮食请客送礼，以粮易物，假公济私，使许多粮食流入资本主义渠道，破坏了国家的粮食政策和物资调拨计划。这种现象说明，不论是我们暂时困难，还是在胜利前进的时候，资本主义自发势力都会向我们进攻，说明对资产阶级专政的极端重要性。

二十多年的阶级斗争实践告诉我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孔孟之道，资产阶级思想，几千年来的私有观念，无时无刻不在向我们进攻，无时无刻不在腐蚀我们。因此，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

第三是因为，在国际上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无时无刻不在妄图颠覆、侵略我们，而国内外的反动派又总是相互勾结的，并且千方百计地在我们党内寻找和培植他们的代理人。同时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也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这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阶级根源。党内也必然有人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公社有个大队党支部副书记被富农分子用美人计拉下水以后，就成了阶级敌人的代理人。他前半夜开共产党的支部会，后半夜就和阶级敌人在一起鬼混。阶级敌人就通过他制造谣言，散发黑

传单,贪污盗窃,破坏集体经济。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的一个新特点,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由于上述国内和国外的原因,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无产阶级专政是绝对必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坚持还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斗争的焦点。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都否认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有阶级斗争,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苏修叛徒集团大肆叫嚷阶级消灭了,阶级斗争不存在了,“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不再是必要的了”;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也大肆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他们的罪恶目的,都是麻痹我们无产阶级的革命斗志,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伟大领袖毛主席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提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我们党制定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条基本路线是我们党和国家的生命线,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使我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的根本保证。

## 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 落实到每个基层

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是什么？

通过学习，我们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不但要镇压国内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不但要防御和粉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颠覆和侵略，还要把全体劳动群众特别是小生产者引上社会主义道路，并使他们在这条道路上不停顿地前进，逐步清除旧社会的痕迹，战胜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传统观念和恶习，逐步地铲除产生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土壤。一句话，就是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毛主席教导我们：“**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二十多年来，我们始终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加速资本主义的灭亡，促进共产主义因素的成长，摆在第一位，从各方面落实这个任务。

要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好，首先必

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政权变不变，根本在路线。毛主席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为我们制定了一条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二十多年来的斗争实践告诉我们，只要坚持这条基本路线，就能克服一切困难，战胜一切敌人，由胜利走向新的更大的胜利。

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大寨的一切变化都是斗出来的。我们不仅同阶级敌人斗，同资本主义斗，还要同修正主义斗，同旧的习惯势力斗，一直斗了二十多年，越斗越

胜利，越斗越进步。斗，就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实现革命转变。斗，就是抓倾向性的问题，充分揭露，狠狠批判。不揭露矛盾，就会看不到问题，就会故步自封。陈永贵同志经常说：“成绩不说跑不了，问题不揭不得了。”革命就是解决矛盾。矛盾解决了，就能推动社会不断前进，矛盾得不到解决，前进的步伐就会停顿下来。

我们大寨没有因为自己是先进队，就忽视揭露自己工作上的问题，特别是阶级斗争问题。恰恰相反，我们认为，先进，就是走在别人前面，别人还没有走的路子你走了，你就会遇到别人还没有遇到过的问题。所以，把前进中遇到的问题揭露了，解决了，你就又前进了一步。例如，党的“十大”以后，党支部带领我们贫下中农，对照“十大”精神，总结了抓大事的经验教训。一总结，就发现了问题。有些不好的东西，过去没有，现在出现了；有些被批判过的东西，又偷偷地恢复起来了。这是为什么呢？经过分析研究，我们认识到，在新的形势下小生产者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又有所滋长，而它的主要表现，在我们大队就是化公为私，损公肥己。于是党支部发动群众开展了“政治上反复辟，思想上反腐败，经济上反蚕食”的斗争，进一步揭开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

斗争的盖子，发现我们这里不仅有化公为私、损公肥己的行为，而且有贪污盗窃的行为。事实教育了党员和贫下中农，使我们深深地认识到，我们大寨虽然是先进队，但资产阶级并不因为是先进队就不向我们进攻。如果放弃了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就会变质，资本主义就会复辟。因此，我们必须时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同资本主义斗争到底。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就要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狠批唯生产力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大农业，是在农村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但是，怎样搞生产，也存在着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搞清楚政治同经济，革命同生产的辩证关系，必须坚决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把生产置于政治统帅之下，不断批判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批判就生产论生产的错误倾向。毛主席早就指出，合作化后农村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不抓这个矛盾，不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生产怎么能搞上去呢？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了复辟资本主义，曾大肆鼓吹反动的唯生产力论。他胡说什么：“现在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

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叛徒、卖国贼林彪也曾叫嚷“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唯生产力论的要害就是否认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取消党的基本路线，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我们大队有的人就由于受唯生产力论的影响而错误地认为：“地主没地了，富农不富了，现在的任务就是搞好生产了”。因此，他们整天只讲生产，抓生产，就是不讲无产阶级要对资产阶级专政，不抓党的基本路线，不管社会主义方向。究竟是就生产抓生产，还是用革命统帅生产，抓革命促生产，这不是一般的工作方法问题，而是一个路线问题，是要不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在路线问题上我们大寨从来是寸步不让的。我们同唯生产力论的斗争也有一段历史了，只是过去不叫这个名堂，叫做“反对单纯生产观点”。周总理在讲大寨精神时，头一条就是政治挂帅、思想领先。这个原则就是同唯生产力论对立的。二战狼窝掌以后，在一九六三年，二十多条大坝被一场洪水冲光了。有人叹气，有人泄气，地主富农则暗中高兴。当时要是就生产抓生产，群众就发动不起来，想三战也没门儿。我们大队党支部从政治上看问题，放手发动群众，打击地主富农的破坏活动，批判只顾眼前不顾长远的错误观点，

使干部和群众认识到三战狼窝掌，是打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仗，而且是非打不可。结果很快就制服了狼窝掌，用事实批判了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从这些事实中我们懂得了一个道理：我们共产党是搞阶级斗争、搞无产阶级专政的党，不是单纯种地的生产党。埋头生产，不抓路线，不看方向，生产是永远上不去的，即使上去也不是社会主义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只要强调政治挂帅，强调抓革命就可以不抓生产了。我们一定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搞得更好。我们要和全国人民一道，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

要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好，必须不断地教育和改造小生产者。毛主席教导我们：“**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合作化以来，我们党支部坚持不懈地、耐心细致地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用回忆对比的方法不断地向农民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坚定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

在教育改造农民的时候，我们党支部注意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人民内部的问题，我们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来解决。对于个别人的某些资本主义倾向和错误思想，我们

坚持正面教育，做耐心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我们大寨有个规矩，一般社员除非有特别重大的问题，不上大会做检讨。对犯有错误的社员，总是采取忆苦思甜，今昔对比，先进与落后对比的办法，引导他们自己教育自己，从思想上划清是非界限，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对于个别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人，也是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只要他们接受教育，愿意改正错误，我们就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必要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帮助他们提高觉悟，认识和改正错误，回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只有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才能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才能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在教育改造农民的时候，我们党支部把实现“两个决裂”作为主要内容。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要清除这个基地，单有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不行，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说，**不仅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而且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sup>①</sup>合作化二十多年来，我

<sup>①</sup>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1—272页。

们始终坚持批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腐朽没落的旧意识形态，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批林批孔运动以来，我们在同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斗争的同时，狠抓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对几千年来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起了全面进攻。我们深深体会到，同旧的意识形态的斗争，实际上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农民的斗争，是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农民的斗争。在同旧意识形态斗争中，我们遵照毛主席要**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的教导，积极支持和发扬广大群众敢于冲破资产阶级法权狭隘眼界的共产主义首创精神，同时狠批了危害集体的私有观念，发动群众议私有观念的危害，查私有观念的阶级根源，批私有观念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反动性。私有观念是几千年来剥削阶级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它起着涣散人心、限制人们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反动作用，是滋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我们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就必须同旧的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贫下中农说得好：“同传统的私有观念彻底决裂，这是挖资本主义的祖坟，刨

修正主义的老根，筑社会主义的长城，育共产主义的新人的大事。”

要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好，必须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毛主席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对资产阶级法权，应当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以便在长期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为逐步缩小以至消灭三大差别创造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如果对资产阶级法权不加以限制，而是巩固、扩大、强化它，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就会很快地发展起来。二十多年来，我们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实际上都是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作用。我们坚持了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每个干部都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分出现，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这就把干部放在群众监督之下，防止了干部搞特殊化，防止了滋生特权思想和等级制度。我们坚持了国家、集体、个人“三兼顾”的原则来分配总产品，把生产的粮、油、蔬菜、水果，除社员生活所需和集体适当储备外，都交售给国家。这样做不仅为国家做出了贡献，也避免了一些人利用剩余农产品搞资本主义活动。我们根据生产发展水平和社员消费水平，几年

来把劳动日分值稳定在一定水平上，这样做既有利于扩大公共积累，又缩小了因人口和劳力多少的不同而带来的生活水平的差别。我们采取“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分”的办法，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这种做法既实现了多劳多得，又培养了共产主义劳动态度，缩小了社员之间在劳动报酬上和生活水平上的差别。一九六三年遭受特大洪灾以后，我们大队统一规划，盖集体房屋分给社员居住，这样做不仅增进了社员的集体主义思想，解除了社员一大经济负担，也有利于缩小社员之间生活水平的差别和城乡差别。通过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这一切都有利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要落实好无产阶级专政这一重大任务，必须建设一个革命化的领导班子，把领导权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路线正与偏，领导是关键。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核心。只有把党支部领导班子建设好，才能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列宁指出：“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sup>①</sup>我们深刻地体会到，合作化二十

<sup>①</sup>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第197页。

多年来，我们大寨所以能稳步前进，就是因为有一个团结战斗的坚强的指挥部。批林整风以来，我们党支部根据毛主席关于**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教导，进一步整顿了领导班子，实现了老、中、青三结合，使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

要建设一个革命化的领导班子，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人常说：“一懒生百邪”，一个人的变坏，往往是从懒开始的。懒、馋、占、贪、变，是好多干部变坏的演变过程。毛主席教导我们：**“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我们大寨的干部始终没有走过邪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真正做到了：不自私，不特殊，不脱离劳动，不脱离群众。二十多年来，大寨的山在变，地在变，产量在变，但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作风始终没有变。干部总是同群众战斗在一起，汗水流在一起，心贴在一起，始终保持

劳动人民的本色。他们站在高处，看在远处，想在大处，干在实处。我们大队的干部每年要劳动三百多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有几个同志分别担任了省、地、县的领导职务，地位变了，荣誉高了，担子重了，工作忙了，但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不是松了，而是紧了。干部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就保持了普通劳动者的本色，有效地抵制了资产阶级思想和旧的习惯势力的腐蚀和影响，密切了干部和群众的联系。干部处理问题，不是靠手里有权，不是靠官架子，不是靠威风，而是靠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靠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靠说服教育。干部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就越炼越坚强，越干越会干，迎着阶级斗争的风浪茁壮成长。

要建设一个革命化的领导班子，必须经常吐故纳新，积极开展思想斗争，保持干部队伍的纯洁。我们大寨的领导班子每年冬春都要“开门整党”，进行整顿，通过总结经验，提高干部特别是新干部的战斗力和革命事业后继有人，使领导班子永远保持团结战斗的革命精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昔阳县非常重视领导班子的建设问题。各级党委在这期间把那些混进党内掌了权的坏人，被阶级敌人拉下水的干部，搞资本主义不搞社会主义的一、二

把手，统统从领导岗位撤下来，对不继续革命的“民主革命派”和不斗争的“老好人”，也分别情况作了组织处理。这样做既保持了领导班子的纯洁性，又提高了领导班子的战斗力。

要建设一个革命化的领导班子，就必须坚持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同时充分发扬民主，把干部放在群众的监督之下。我们大寨贫下中农过去身受三座大山的压迫，最痛恨旧社会，最热爱新社会，他们是我们大队的台柱子。只要台柱子树起来，天就塌不下来，就是塌下来，也能顶得起。党支部坚决依靠贫下中农，请老贫农给党支部当参谋。凡是比较重要的事情，党支部总是先找他们商量，征求他们的意见，然后再交给社员讨论。这些老贫农阶级觉悟高，敢想敢说，说得在理。他们一带头，群众就跟上来。贫下中农在政治上很敏感，阶级敌人有什么活动，他们很快就能发现。党支部依靠他们，就能有力地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二十多年来，我们大寨的干部紧紧和贫下中农在一起，干部有错误，群众敢提出。群众意见提得及时，干部改得快，这就保证了不变质。党支部为了方便群众对干部的监督，除平时不断征求他们的意见，鼓励群众批评干部外，在每年冬春整党的时候，每个

党支部委员都要在群众大会上解剖自己，让群众“评论”，看干部的方向对不对，路线正不正，思想境界高不高，群众观点强不强，执行群众路线好不好。我们把这种做法叫作“把火车头开进大修厂”。

要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好，就必须**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掌握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翻身求解放、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真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特别是批林批孔运动，使我们认识了学习理论的重要性，尝到了学习理论的甜头。最近，毛主席又向我们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这就进一步明确告诉我们学习和掌握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同反修防修的重要关系。

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我们要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我们要把反修防修的斗争进行到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最后消灭阶级向共产主义过渡准备条件。在斗争的实践中有许多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需要我们来解决。二十多年来，我们大寨大队虽然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的指导下，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离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还相差很远，我们已经夺取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我们坚信社会主义制度一定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共产主义一定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我们一定要更自觉、更刻苦地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粉碎阶级敌人的反抗，逐步地消除旧社会的痕迹，把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进一步扎扎实实地落实到我们基层，不断夺取新的胜利。

前言  
目录

录  
前言

- 一、《哥达纲领批判》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
- 二、彻底消灭私有制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 三、地主资产阶级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
- 四、社会主义社会总产品的分配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
- 五、正确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 六、为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创造条件
- 七、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可靠同盟军
- 八、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
- 九、用革命手段消灭雇佣劳动制度
- 十、暴力革命是推翻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
- 十一、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 十二、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